





【编者的话】

自 1870 年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以来，留学生的命运开始和近代中国紧密相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与追寻救国道路的革命者，都通过负笈海外探索强国之策。改革开放后”留学”一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沉重使命不再肩负，一脉相承的是文化差异的冲击下，留学生对自我和时代认知的追求.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留学生的精神成长和生活感悟。



首先呈现几位留学生的自白。芝加哥大学学生陈博指出，留学名校的光环背后，留学生的发展路径其实颇为狭窄，留学生在美上行空间极其有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宁湖则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留学的意义，他指出出国留学不仅让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认清自己，而且更加认清自己的祖国。如果说男生更加关注宏观，那么女生更能体会留学生活中的甜酸百味。来自卫斯理学院的吴昕悦对照百年前那些改变国家命运的留学生，叩问自身留学的意义；而当时政治学博士生在读的刘瑜认为，留学生活可能会有深刻的孤独，然而其中更加蕴含丰富自我的契机。

除了留学生的自我反思，另一个有趣的角度是旁观者对留学生的审视。作家许知远访问剑桥大学期间,对在剑桥的中国学生有深刻的观察。他颇为悲观地指出，留学生不再把自己定位为社会的改良者，而是陷入一种“新的封闭之中”，追求个人的享乐和成功。留学本应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然而很多留学生出国后比以往更为急迫地希望融入现有体制。

对自我和时代的追问，是百年前留学生的光荣传统。以一代大师胡适为例，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兴盛和教育发展等问题的看法，都被留学的经历深刻影响。但留学生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21 世纪经济报道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留学生的关注点愈加从探索社会转移到自身的体验上。历史学家资中筠则在一次演讲阐述了留学的历史演变，先生希望现今留学生能继承前代的传统，“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不能抱镀金心态又或自以为是。

最后，我们选入日本留华学生加藤嘉一的中国奋斗感悟。同为留学生，中国人在外的成长历程，和他国留学中华的学生有何异同？在比照之间，读者能够对留学生的精神状态和成长历程产生更深的体会。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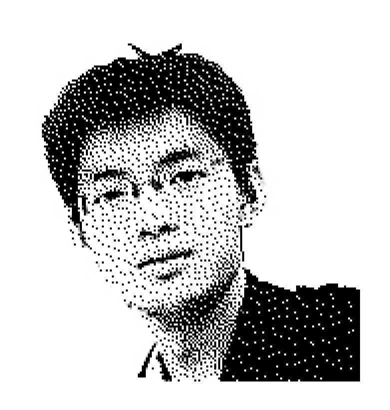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悟】

9-1 陈博：留学路的宽与窄



“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

留学路看起来很宽。我们当初在写着大学申请作文的时候，谁不是在憧憬着海那边自由的天地？在文章里，我们谁不是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十八年生命娓娓道来，再展望着去了那边的大学一切会更好？我们谁不是对着文理分科，一考定音的高考摇头叹息，向往着自由选课，自由思辨的美国大学？

但后来我们会发现，学术自由只剩下周五在图书馆内独坐的复习，丰富生活只成了周末唐人街的短途旅行。白人过度酒精的狂欢派对很快让人疲倦，空虚，只剩下朋友间一起做做饭，聊聊天，会让人精神一振。但这个世界还是很小。有时候身陷在玉米地的中央，翻过学校的后山就是一片加利福尼亚的沙漠，有时候下山都要半小时，有时候，只有一个小镇人来人往，让人记不起北上广跃动的繁华。

但更小的不是身边的物理空间，而是文化空间和精神的延展。这终究不是我们的国。你可以和美国本土的，印度的，韩国的，各地的人痛饮畅聊，但有时还是会感到切身的游离感。这和融入与否无关，和适应能力无关。这甚至也不全然是文化印痕的关系，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听得懂美国人开的玩笑，口中的段子，觉得那些傻呵呵的东西也有可爱之处。身份认同也有太多的文章讲述过，我无力涉笔。近一段时间有大量文章谈到了文化的归属问题，也有越来越多

人觉得逆心而为的强行融入是一种自我虐待。但姑且不论个人偏好的不同，我所关注的是，一个留学生会认为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才是有意义的，而他又有多少的手段和途径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前者关乎目标，后者在于路径。

但留学生真的有很多选择吗？我前一段和不少朋友聊起。我们都曾单纯美好的被那些周游世界的旅行日记所激励，被想象中美国人自由追求职业，浪迹天涯做街头艺术家的故事震撼，也想过像那群牛逼的人士作出彪悍不需解释的发明，甚至愤然离校，创业起家。但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魄力，能不顾家庭为自己花费的数十万学费放弃一张文凭，一份稳定可见的工作？乔布斯面对高昂的学费可以做出退学的决定，学一年书法，但一个中国孩子能够在放弃了高考后进了美国大学，再这样和父母摊牌吗？

更何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度分工下文凭首先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这是社会面对庞大人口时所演化出的必要机制，效果犹如专业认证，是人类减少不确定性的伟大创举，并不是反文凭束缚的几句口号就能推翻的。再者，在各领域精细化发展的今天，无论是科学还是社科领域，天才洞见的时代已经衰落，剩下的是不断试验，反复验证以及测算来推动的实证发展年代，是依靠巨额 Research & Development 推动的进程。即使再有专利局职员能推导出世界的基本定理，也要通过学术界的层层检验，挑战，再被实验物理不断验证。这又何尝是一个人之力所能引领的？自由浪漫的英雄主义年代早已经过去，在这个实验室埋头出成绩，教授变老板的年代，潜心耐寂寞往往是最常见的。但这岂不意味着十几年的孤悬海外？如此一来，有心归去也路途艰难，一入科研深似海，这大半辈子就要留下来了。科研之路漫漫，走的很踏实，但并不宽广。

更何况是商业。

走上留美求职之路的人会发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世界里，咨询，金融已占半壁江山，软件工程，市场紧随其后，但看满目招聘空缺，多少都要求美国身份，除了少数财大气粗的公司外，愿意赞助工作签证的凤毛麟角。而国内的各种机会却又远在万里之外，没有面试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了先手。留学生身在海外有时反而夹于骑缝之中，两头不讨好。

在大多数的招聘职位中，无论起薪高低，往往都是以数据分析员开始。美国的商业早已经到了高度体系化，乃至自动化的过程，和人打交道而且能产生高额利润的部分已经缩减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余下的则是海量的数据和商业模型的执行，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金融投行，都高度建立在惯性流传下的数据之上。扩张，这一最富有使命性和刺激性的工作已经被精耕细作所

取代，当年摩根高盛血拼疆土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反而是修修补补，遇上大型危机的时候这些巨型机构会虎躯一震。但问题是，基层入职的人在遇到危机时常常要担忧是丢饭碗，而不是出谋划策。在平时，经常扮演的还是高级螺丝钉的角色，在日复一日的高度脑力劳动中期待升迁。

但这对大多数美国梦来说不也够了吗？一栋房子，一个绿茵的社区，一所子女就读的好学校，一架车，偶尔的假期旅游。这种在法治国度下的平静生活自然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怎么看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美国丽人》中那种生锈阶级窒息般的痛楚，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吧。而且，如果这条路到了顶峰也就如此，那还会选择开始吗？

在美国走创业之路，走从政之路的，或者走艺术，摄影之路的，哪一个不需要勇气和决心呢？我钦佩他们的坚定，但也知道这对很多家庭的人来说是困难的。投行之热，就在于它给了中产阶级第二代一个稳定快速的致富职业，何况这确实是需要脑力和体力的活，燃烧生命起来绝对值得那个价格。它缺少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当初你我写下的豪迈申请书向去甚远，但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在集体力量体制化运行的世界里已经足够让一个留学生拥有一个较为宽广的空间了——尽管此路很窄，能走的不多。

是的，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那时候，窄的路也就变得宽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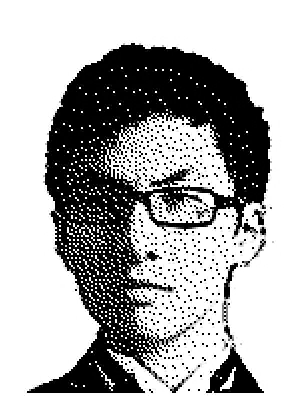
但问题是，你真的放得下去吗？

如果你发现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窄，你是否有一天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陈博：芝加哥大学学生，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40402460/770945372）

【返回目录】

9-2 宁湖：出国还是不出国之微观人生



"这些迥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现在的我已不再自恋，不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渐渐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不仅仅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比性，人比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愚蠢的。自己努力干好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

两年后的后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 2008 年 3 月 4 日写的。这是一篇很神奇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有 70000 多的点击率，被分享了几千次，转载了近百次，还有幸收到了四五千人的好友申请。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我的第一个网刊 Free Speech Movement Cafe，我参与的第二个网刊《北斗》的人员组成也将完全不同。《北斗》仍然会诞生，但它能不能熬过第一个暑假的冷清就很难说了。没有《北斗》便不会有《熊焰》，也就不会有博文，王琛，老叶这么一帮好兄弟，更可怕的是我就不会遇到我那既有小聪明又有大智慧的女朋友了。

而这一小片文字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所论及的主题很热门：出国，爱国。

我们要出国，但为什么要出国？爱国与出国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大多数留学生出国后都更爱国了，这可以从 08 年圣火传递时的示威与反示威中看出。这又如何解释？

今天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我是想重新用它说明我的一个观点：

出国未必就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但出国对于不安现状敢于探索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手段。6 年前，我很幸运地圆了我的美国梦，1 年后我会去追逐我的巴西梦。就算再苦再累，能一边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一边欣赏人生的丰富多彩就已经很幸福了，不是吗？

文章如下：

最近一位北大的陌生人问我"如果出国读了二流的学校，你觉得值得么？"

在我的上篇文章中有很多人对我的爱国报国论很鄙视，觉得我那曲宏观的高调唱得很虚伪。正巧最近我也一直和我的两个室友（Brady Page 和 Clive Parkinson）争论爱国主义到底应不应该提倡。在反对爱国主义的人里，中国传媒大学李源同学写的《中国人的病》算是写的比较有深度的，其中这一段写得一针见血：

爱国主义的概念于我而言无疑是尴尬的，首先以目前的精神境界我只能做到去爱跟自己有关联的人和环境，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给予了我爱，这是一种具象的爱。如果有一天，我的境界达到了"兼爱"的标准，那么我爱的将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整个宇宙。被一道国境线左右了自己的爱恨，那十分愚蠢。所以，别来教育我说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够不容易的了"、"首先要爱自己的城市"这些昏话，我上中学时也做过一阵愤青+民族主义者，但热血退去思考袭来，人总是要进步的。

结合这两个问题，从微观经济的视角为起点，我昨天写下了下面的这一堆文字：

在出国不出国的问题上，从最现实的角度出发，你要自己去衡量其中的成本和收益。

（一）钱的问题。这当然是看你家境如何，一年 4-6 万美元对工薪阶层来说是天文数字，对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亚洲规模最大的独立发电企业，华能国际的董事长）来说只是一颗鼻屎。与之带来的成本压力自然不同。估计你也会考虑你未来的经济收益，查一查你要学的专业的就业前景在中国和美国怎么样，由于是二流的学校，毕业后受聘于一流美国企业的机率也会收到一些影响，这些都要你自己把握，在二流企业干得好跳槽到一流企业的大有人在，只看你有没有那个耐心。

（二）机会成本。你如果对经济学稍微有点了解对这个就肯定不陌生，但大多数人在做决定的时候（特别是感情决定）这个概念完全不经大脑。你的第一稀有资源是你的时间，你的黄金年代。这个时期的决定将会为你的一生定下基调。选择必然意味着放弃，你的第二选择就是你的机会成本。获取国外的优越条件就注定了放弃你在国内经营多年的地位，人脉，包括与亲

情，友情，爱情的疏远。刚开始两年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万事开头难，而与国内的联络必然会加重你的思乡之情和你对机会成本的忧虑。但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在异国的情缘是多么的价值连城。

（三）思想的形成。中国 80 后的年轻人是迷茫的，因为我们缺乏有意义的人生参照物，大多数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贫困等原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起不到太多的指引作用。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最重要的三个衡量一个男人成功与否的标尺是：考试分数，钱，女朋友的魅力指数。其中女朋友的魅力指数又可细分为：胸围，腰围，臀围，眼睛大小，皮肤颜色深浅，青春痘数目，头型和衣着与当红歌星的贴近程度。

我们上小学，初中，高中（我在美国上的高中）时身边的朋友都和我们想的大致是一个样子：

假设你是个典型的中国男生。

你从小好好做题，好好考试，考好中考、高考，上个好高中、好大学，读个自己拿手的专业，大一大二大三一边混一边谈恋爱，大四猛地醒过来开始考研出国工作三选一，接踵而来的是这个十分严峻且严肃的问题——女朋友怎么办？很多人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最佳选择，因为爱情是流行的，强大的，神圣的，无坚不摧的，值得付出一切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

工作了，一个月四五千，上班朝九晚五瞎忙压力大，周末无聊喝酒打牌洗桑拿。随着岁月流失，你明白了很多事情，但你已经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很多“如果……就好了”的句子你只能憋在心里，因为你老婆会很烦你整天“想当年”。转眼间你已经三十多岁，四十岁的人了，你做了个中型企业的中层领导，你看着每年进来的年青人的热情和拼劲，你发现你已经老了。你的领导里比你年轻的都大有人在，你还得对他们毕恭毕敬。那些坐上了顶层的人又恰好都是海龟，尊老爱幼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臭很响的屁，见你就直呼你名字，还问你有没有英文名。你不想太冒尖，所以你编了一个很大众化的名字“Mike”，久而久之你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叫 Mike，你变成了一个容易被替代的人。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你起床的时候特别爽，感觉你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去拯救地球，想再去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再搏一次，但你刚出门时又发现你的房款还没交齐，儿子长大了读书加摆阔要花钱，老婆到了更年期，不仅脾气不好还有骨质酥松症。你长叹一口气，高呼人生苦短，生不逢时，但一秒钟后又打起精神来了，因为你想到了你性感的秘书。你开始了一段精彩

激烈的外遇，你的存款和精液都开始流向外人田。每次你老婆想和你做爱，你都说“啊，我今天好累了。”久而久之，你体贴的老婆不再问你了，因为她觉得你已经性无能了，所以不想伤你自尊。但突然有一天东窗事发了，你的老婆终于发现了你的外遇，她哭得很伤心（意识流：2007 年 12 月 29 日礼拜六临晨一点，我和 Clive 坐在上海的出租车里，车内广播传出了一位中年妇女针对老公外遇的哭诉。当时小感慨了一下，记在了日记里）。但为了孩子你们没有离婚，你们的更年期依旧，儿子的逆反期开始。

然后孩子长大了，但因为“工作忙”很少来看你们。后来电视机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虽然我以上四段是编故事讲笑话，而且你当然可以举得出成功人生的例子，但如果这种混沌的日子能引起你心中哪怕一点点共鸣的话，请仔细为自己做出思考。

与其这样很混沌地过一辈子，还不如趁年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有一个误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指的不是叫你在国庆黄金周里去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游客比谁挤得过谁，谁粗话骂得更难听，走马观花，每见一个景点牌子就拿新买的数码相机叫别人给自己和自己背后挡着的景点照张相。

你应该趁年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多个陌生的地方真正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吸取当中的精华，阅读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关注那里的政治经济生活，最重要的是与当地人结下一辈子的友谊并赢得他们对你的尊重。

出国学习和生活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过程。

在出国前我并不爱国，我除了自恋之外就只爱对自己好的人。我高中时来到了一个华裔人口只占百分之一的高中，百分之七十是白人，百分之二十五是墨西哥人，剩下的是黑人还有其他亚洲人。就像不知道什么是黑暗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一样，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我意识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还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新同学们总是问我是从哪个小学来的，我说我是榕湖小学来的，于是我成为了榕湖小学的宁湖。我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和其他班的人打篮球，球友们总是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是 37 班的，于是我就变成了 37 班的宁湖。我上初三的时候打过排球校队，外校的队员总是问我是从哪个初中来的，我说是二附来的，于是我成了二附的宁湖。无论是新同学，还是球友，还是其他学校的，他们在认识你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把你归类，然后根

据以前和你同类的交往还有与你的交往对你所属的集体作出印象式的判断。比如说，作为桂林第一的中学，当我说我是二附来的，别人就会羡慕地说，“你这个卵仔那么狠啊！”

而我到美国的那一天才是我真正扮演“中国人”这个角色的第一天，因为当别人问我从哪来的时候，我的回答不再是榕湖小学，二附中，或是桂林，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人生的这一新的阶段里，我在我的同伴面前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时时刻刻盼望着祖国的富强，每天都关注着来自祖国的喜讯或噩耗。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有人会因为他对中国的评价好坏来对我的个人形象进行加分减分。这也促使我在高中时做了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特别是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所独有的凝聚力和自我解释力。那些我自己思考出来的结论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估计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有详细的研究讨论，但那种因为环境所引发的独立思考是我一辈子都很珍惜的经历。

与此同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对比着与祖国的不同，也无时无刻地注意自己的形象，而不为中国人丢脸。在高中和大学里，我交到了很多和自己有很大文化差异的好朋友，其中很要好的有：立志成为大脑外科医生的伊朗 Baha'i 教宗教难民 Sattar Khoshkhoo（高中挚友），想做美国总统的英国新教基督徒 Clive Parkinson（大学室友），街头艺人 Blaze（Berkeley 的忘年之交），现在在泰国传教的犹他州摩门教徒 Reiley Ewing（校排球队队友），约旦日本意大利裔采花大盗 Ziad Shahin（高中学术十项全能队队友），来自洛杉矶黑帮区但出口成章且词藻华丽的黑人 Thurman Reed（大学楼友），还有高中时因为穷贩卖大麻差点被刀砍，现在改行了在投资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做企业融资的韩国裔巴西籍天才 Cesar Lee（大学同班同学和礼拜六晚上一起喝啤酒打牌的好兄弟，我能喝酒但不嗜酒不抽烟不吸毒），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迥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现在的我已不再自恋，不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渐渐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不仅仅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比性，人比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愚蠢的。自己努力干好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些人和事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走向形成了更成熟的视野。

美国的文化就是她没有一个单一的文化，这就是美国的美。

三年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和一个高中的好朋友 Ziad Shahin 一起回国，也是我第一次回国。当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大餐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从美国回来的宁湖。特别是有 Ziad 的陪同，我很多时间还得说英语，据说我的很多行为举止都变得很西方化了。而我从美国回来反观中国社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很多我以前发觉不到的丑陋现象或是珍贵瞬间变得那么刺眼，那么显而易见。很多海龟都不愿同胞叫自己美国人，但当我的朋友这样拿我开玩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反感。因为我对两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都已经有了真挚的热爱和了解。

2007 年 11 月 13 日我写下了这篇日志，题为《双重爱国情操》：

有没有人在美国待了几年后陶冶了双重爱国情操？

不管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是 The Star-Spangled Banner，你听到时都会热血澎湃。你在中国朋友面前会为美国辩解，而在美国朋友面前会为中国辩解。你对华夏五千年的兴衰略知一二，也对美国 231 年的历史稍有研究。你既喜欢牛奶面包奶酪，又喜欢包子饺子粽子；既喜欢听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又喜欢 The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既喜欢唐诗宋词，也喜欢 Ernest Hemingway 的 The Old Man and the Sea；既喜欢冯小刚的《大腕》，也喜欢 Tim Burton 的 Big Fish。

不管世界局势风云变换，你总希望中美人民能友好相处互相体谅，在世界各国面前体现大国的风范。

你深知两个国家在历史和当今都犯下过令人痛心的错误，但你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局势，而认识到：很多错误虽然是不可认同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

在美国四年来的学习生活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这种双重爱国情操。作为龙的传人，我不仅希望有蛇身、鳄首、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我还要一对有力的翅膀和喷火的神力。

最后送你一段我最喜欢的台词之一，同样是我去年十一月份的一篇日志，来自 *Fight Club*：

Warning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then this warning is for you. Every word you read of this useless fine print is another second off your life. Don't you have other things to do? Is your life so empty that you honestly can't think of a better

way to spend these moments? Or are you so impressed with authority that you give respect and credence to all that claim it? Do you read everything you're supposed to read? Do you think everything you're supposed to think? Buy what you're told to want? Get out of your apartment. Meet a member of the opposite sex. Stop the excessive shopping and masturbation. Quit your job. Start a fight. **Prove you're alive. If you don't claim your humanity you will become a statistic.** You have been war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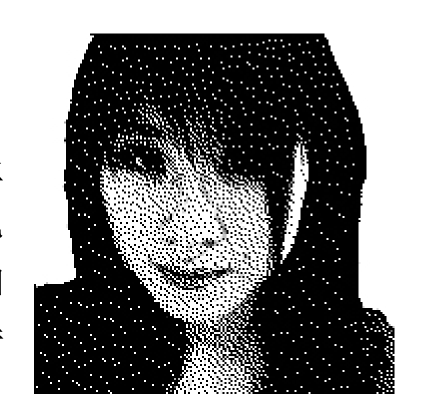
建议每一个人都去看这部经典电影，这是 Berkeley，Stanford，Princeton 的 Facebook 上排名第一，Harvard，MIT 上排名第二的影片。里面的对话难度和艺术性很高，一定要对着字幕看懂每一个字才能体会作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绝妙批判和讽刺。

又写得超长了，就此打住吧。文采拙劣，文风装逼，伤了大家的眼睛，哥先给大家陪个不是好了。

（宁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95723474/449631648）

【返回目录】

9-3 吴昕悦：卢瑟，伦敦和《金瓶梅》



“即便很多人說，今非昔比，比起那些世纪初的大牛们，我们这帮人只会花钱跷课打 DOTA——可是当年的大师也还尚且没有被光环笼罩，是和我们一样漂泊在外的留学生罢了。看着我身边的人，就算他们再不靠谱再窝里斗，我也希望那些四处奔走的有志青年里有胡适也有陈独秀，泡在图书馆刷 gpa 的学霸里藏了个陈寅恪，而即便是尝尽辛酸念着归乡的窘迫“卢瑟”里也总有个会成为老舍的 C. C. Shu。”

这一切是从那个无聊的下午开始的。

新英格兰入冬之后阳光变成了奢侈品，所以午后天气好的时候我就会跑到图书馆三层靠窗的小沙发上读书，正好旁边是中文书架，学得头昏脑胀就去抽几本读。这次正好翻到埃氏所译的《金瓶梅》，记得 Egerton 是个英国怪人，花了十五年时间把我国第一淫书翻译成英文结果出版过程中障碍重重，于是只得把淫秽描写段落替换成拉丁文（！简直就是一个英式笑话了。自古以来爽歪歪的篇目都是教士的特权，连舶来品都不例外==），后来有人干脆把拉丁文的段落摘出来单独翻译出版成一部艳情小册子，再加上海外华人抗议此书有辱国体（我们国体甚贵，于是被辱就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了，就像越是自视甚高的贵妇人越容易觉得自己被人轻慢了），完整本一直拖了很久方付梓，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氏的译本也是此书唯一的英文译本了。

在扉页上 Egerton 写明了致朋友 C.C.Shu。对于读书，我一向是个好事之人，于是留了个心去读序言，果然后面提到：如果没有这位好基友根本不敢说自己能够完成此举等等（without the untiring and generously given help of Mr. C.C. Shu, who, when I made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那么这个中文讲师是谁呢？时势造英雄，世纪初那帮漂洋过海的哥们大多牛得发亮，随便一个路人甲刨根问底一下都大有文章。

于是我就顺藤摸瓜去查了这个中文讲师，果然不出所料，初相逢还是旧相识。

1924 年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的年轻讲师，Egerton 的好基友好室友 C. C. Shu 同志，全名 Ching Chun Shu，中文即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

不过这个时候帮着室友翻译《金瓶梅》的中国留学生还不是老舍，他甚至还没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位大龄青年 C. C. Shu 每天都在纠结我们现在一样纠结的问题：没钱啊没妹子啊家里的老妈啊食堂难吃啊。——当然，这么痛苦的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俞平伯留学英国之际就因为“洋食难吃，课业艰深”索性从学校跑路了，好基友傅斯年一路追到马赛都没能把此君劝回来。

固然我们总是抱怨留学生质量下降，比起当年那些大牛，现在的我们俨然是一群酒囊饭袋。但是——时过境不迁。当年的留学圈也和现在一样分为三档：康奈尔大学的普通青年胡适期中考试狂飙 GPA 后还能给自己煮碗鸡丝面然后继续打牌；高帅富徐志摩出入各种大师的宅邸犹如逛自家花园，动不动还更新条微博说我今天又碰见宅男女神林徽因了；而二逼青年 C. C. Shu——穷得叮当响，每年挣 250 磅花 300 磅；吃食堂吃出胃病，养不起，只能去廉价的中国餐馆喝一碗一先令的汤。至于外貌，据宁恩承回忆是这样的：“舒同学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亮，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不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当时的 C. C. Shu 穿着长年不换（！）油光闪闪的唯一一套衣服走在伦敦街头，那种超然脱群的程度绝对不亚于宅男秋裤外穿游荡在上海外滩。更悲剧的是：身边连个妹子都没有还老被那个奇葩的英国室友抓起来半夜一起研读《金瓶梅》……

于是，二逼青年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逼成了文艺青年。

这位 C. C. Shu 同志就是在留洋的时候开始动笔杆的，“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就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我的创作经验》老舍）

我对于老舍的书读得又并不多，甚至在此之前不能相信此人也留过洋，因为很多留学生的文笔是能够读出来洋味道的，比如邵洵美仿得一首漂亮的英国诗，比如闻一多《死水》之仿美国新诗派——而老舍自始至终一口珠圆玉润的京片子，把这个城市琢磨得像核桃一样玲珑。现在必须大叹自己浅薄：贵公子们吟诗做赋是早在出国之前就熏陶出来的，而另有剩下的一些人笔耕不辍是漂洋过海内心憋火不吐不快一点点给逼出来的。这个背井离乡说着一口标准

Chinglish 的中国留学生在读了大本大本的英文小说后码起了方块字，这些文字在异国他乡的肚肠里像饥饿一样凝结，而字字句句却都是在北京灰蒙蒙的冬天里就着西北风从冰糖葫芦的甜渍里浸泡出来的。

暑假的时候有朋友采访留学生，问什么时候最想家。我实话实说是饿的时候，思乡是一种最本能的情感，就像饥饿一样。这些漂泊在外的人啃着洋面包嚼出来的爆肚香气，那才是北京最地道的滋味。

我另好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孤身在外的大龄青年是用怎样的心态去翻译《金瓶梅》的（我假定看我这篇文章的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那点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们也动不动拿出来见人了）。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新东方，留学生之间牵线搭桥的鹊桥业务还一片荒芜。即便是现在，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姑娘恋爱也并不是主流。可以想见热情如火的美国女郎看见穿着长年不换的过时衣服的宅男 C. C. Shu 也不会是一张看见了东方王子的花痴脸孔。

在 C. C. Shu 成了老舍之后，他开始写一部书叫做《二马》，讲的是一对中国父子在伦敦和一家寡妇的暧昧纠葛。有趣的是批评家总说这部作品是“不写实的”，这幻想的华人与白人的罗曼中藏了几多辛酸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徐志摩，能一掷千金在欧洲名媛之间吃开一个小圈子。那会儿的宅男们也尚且没觉得为祖国扬眉吐气的重要途径就是搞定个洋妹或者是看着欧美小电影来一发让“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个”。

C. C. Shu 及其同道者大概是羞涩而自卑的，一如我的某个男闺蜜一看到金发大妹子跟他打招呼就僵住，等人家过去好远才说“那个是我们楼的大美女……”郁达夫在《沉沦》里描述留日的男学生在路边碰到结伴走的日本姑娘，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成一团，他被这笑声挠得心里一痒，旋即又有几分羞怒：她们定是猜到我是中国人了……

在赵毅衡先生书中翻到的另一则留学生情事和诗人朱湘有关。朱湘本人自视甚高，并且特立独行,算是个升级版 C. C. Shu。因为 C. C. Shu 同学憋了三年快揭不开锅了才开口跟学校提加薪的事情，而此君在芝大以退学著称——但凡他觉得教授有“辱华“言论他就退课，一门一门地退，一直退到退学。其中他记叙說和一个美国女孩子有了恋爱之情，两人在校刊上以诗答情，你来我往。上个月我去芝加哥，本想查查芝大校刊看看到底是哪位女士，但最终还是行程紧张未能成行。但我倒是更同意赵毅衡的观点：那就是此事也许更多的是朱湘一厢情愿的夸张，因为对诗传情之事实在更像是《红楼梦》的情节而不是美国女孩子的行事方式。比起跨国

恋情，我更相信是那个愤世嫉俗的中国青年瞥见了一双失焦的蓝眼睛，然后从里面读出了一个在异国他乡贴心贴己的林妹妹。

我不知道当时的 C. C. Shu 是否也是同样的心境，但是老舍本人绝口不提他在英国和人一起翻译《金瓶梅》的故事，至少文革时候这一条本应被大张旗鼓批斗的罪名并没有被揪出来。我猜想，当他跳湖自尽前徘徊那一整天的时候，心里可曾记起那个在破公寓的落魄青年，一边读狄更斯的小说一边翻译一本淫书——男女情爱，世事无常，黑黑白白翻了一遍又一遍。

我和一个朋友說我要写 C. C. Shu 还是个留学生的事情，他问我有意义吗。今非昔比。

而对我而言，留学生离乡的情境，百年以来，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即便很多人說，今非昔比，比起那些世纪初的大牛们，我们这帮人只会花钱跷课打 dota——可是当年的大师也还尚且没有被光环笼罩，是和我们一样漂泊在外的留学生罢了。看着我身边的人，就算他们再不靠谱再窝里斗，我也希望那些四处奔走的有志青年里有胡适也有陈独秀，泡在图书馆刷 gpa 的学霸里藏了个陈寅恪，而即便是尝尽辛酸念着归乡的窘迫"卢瑟"里也总有个会成为老舍的 C. C. Shu。

和百年前一样，各路英雄豪杰平地暴起，但当他们尚不自知自己將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扪心自问，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找人脉，有人找德先生，有人找赛先生，有人找绿卡。

也有一些人，他们磕磕碰碰地走遍万水千山，鼻青脸肿，在留学生圈里被笑成了卢瑟，但他们也一样找到了一件受用一生的珍宝。

那就是孤独。

（吴昕悦：卫斯理女子学院学生，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49693315/779665076）

【返回目录】

9-4 刘瑜：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不可遏制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强求”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 点，起床，收拾收拾，把一本书看了一大半的明史的书看完。

1 点，出门，找个 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7 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 email 若干。

10 点，看了一张 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

12 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2 点，跟蚊米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一周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我这人其实一点也不孤僻。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平易近人开朗活泼。有时候，我就是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子集。我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一望无际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也因为一个人思想的先锋性总是通过碰撞来保持的。我担心，我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惊诧于自己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竟然保持了创造力和战斗力，竟然写小说政论论文饱博客而且写得如此饱满热情，我刘瑜又是何等顽强的一株向日葵。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

它还不是气馁，不是得过且过，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样的狗屁歌词，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那天偶然想起我过去几年写的这三个小说，《孤独得象一颗星球》《那么，爱呢》《烟花》，吃惊地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轨迹，从忧伤到怨恨，然后再到绝望。

绝望，就意味着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名字叫"一个人要象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象一支队伍，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现在看来，我也只能面对内心招兵买马了，一个人成为一支队伍。人家一个人象一个军，我象一个营，一个连还不行吗？

当然我的队伍没有他们的那么坚定，肯定有逃兵，经常嚷嚷着要休息，但是，我还在招兵买马呢，还前进呢，还边走边唱南泥湾呢。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上帝给我的顽强和禀赋。它告诉我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教我用虚无、骄傲、愤世嫉俗超越那种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教我用是非感、责任心来超越那点虚无、骄傲、愤世嫉俗。

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简直就是我的亲哥。

因为这幸运，我原谅上帝给我的一切挫折、孤单，原谅他给我的敏感、抑郁和神经质，原谅他让 X 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 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让那么多烂书卖得比我的好，甚至原谅他让我长到 105 斤，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咦，怎么说到这儿了呢？本来是想谈谈自己克服寂寞的经验的，结果活活写成了一篇自我吹捧的范文，就当是本营长写给士兵们的战斗动员书吧，分析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154）

【返回目录】

【观】

9-5 许知远：剑桥杂忆（三）（四）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 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剑桥杂忆（三）

《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初版于 1852 年，手上的这本是 2008 年的新版，淡黄色的封面上有校园生活的铅笔素描。1840 年到 1845 年，美国青年查尔斯•艾斯特•布里斯特德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辩论，醉酒，划船……布里斯特德不是个多么杰出的作家，却是个诚实、敏感、勤奋的记录者。这本书既是一个青年的成长记录，也是两种文明的相遇故事。

此刻的美国仍生活在英国的阴影下。尽管政治上早已独立，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仍依赖欧洲。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狄更斯的最新著作，即使最杰出的美国心灵，仍不免在英国头脑面前略感不安，所以过分善于制造警句的拉尔夫•爱默生要呼唤“美国精神的独立”。

而大英帝国正处于它权力的顶峰，不仅是军事上、物质上的，也是制度上与文化上的。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乌合之众的胜利，一种粗鄙的金钱崇拜的价值观。布里斯特带着文化上的自卑到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在这本书中洋溢着对英国教育的赞赏、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当时只有很少人能意识到，美国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清晨，我无意中买到这本书，并问问自己能否记录出此刻中国与英国的相逢，前者也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



但谁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兴趣？距离“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一百六十年了，大英帝国已经缩回到英伦三岛，人们讥讽伦敦不过是华盛顿与纽约的附庸。牛津、剑桥仍在，却越来越像这个时代的装饰品——它们典雅，富有魅力，却也无关痛痒。它们的毕业生不再统治世界，倘若你观看了最近一场首相竞选，你会发现帝国不仅在物理意义上、也在精神上衰落了，甚至陷入身份危机。三位竞选人，不管是来自哪个党派，毕业于哪个学校，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奥巴马。

过去的十年里，世界权力的中心似乎又一次发生转移，这一次是向东。中国，或许再加上印度，被认定要主导世界的未来。这是眼花缭乱的新变化，中国举办了历史上最昂贵、叹为观止的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宇航员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业规模的榜首，外汇储备无人能敌，甚至一场七十年未见的经济危机也只让她更强大，她被认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注定要象十九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塑造、领导二十一世纪。

中国是新的全球历史的开启者，而欧洲生活在“历史的终结”中。倘若你记得十九世纪的欧洲流行情绪——“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个轮回”，眼前的变化就会更显得兴致盎然。

但倘若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是新的价值、意义的确立，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中国真的能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吗？

很有可能，剑桥为观察这种新的历史力量提供了有趣的角度。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留学是一种汲取历史动力的象征。停滞的中国要从西方寻找科学、技术、制度、思想上的活力。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码头对迎接他的朋友说，“如今我们归来，一切都将不同”。二十七岁的胡适引用的是伊拉漠斯的名句。这是中国留学生最自信的时刻，他们通过充当两种文明之间的沟通者，中国社会的变革者，肩负把新观念、新技术、新组织带入中国的使命。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胡适写道“他（归国留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有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这当然美化了传统，拥有胡适式情怀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留学生只是如鲁迅笔下的上野公园中的清国留学生的模样：“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留学经常不过是个光鲜的标签，为一些人谋取官场与社交场的资格。他们失去了与自己土地关系，却也没接引上的新的源头。

而那些“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往往命运不佳，它们总是被吞没于顽固的中国传统与惰性中。他们的雄心、焦虑、局限，恰好像是中国自身特性的流露。但没人能否认他们的重要作用，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权力、财富、知识的鸿沟，他们是其中的传输带。但悲剧也在于此，他们仅仅是传输带，由于外部环境的紧迫、内在的脆弱，他们从未建立起自身的意志与价值，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局限在工具性的范畴内。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他们太急切于有用，他们可能心地高尚，要拯救祖国，也可能世侩不堪，要谋取个人成功。

很少有人深入理解这强烈的工具色彩的问题与原因。它既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也与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竞争有关。陈寅恪发现二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他忧虑“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在这种功利倾向背后，是个人意志的缺乏。因为缺乏独立、内在的精神世界，人们才会盲从、缺乏耐心，只选择最实用的东西。但它却导致了最不实用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多少像是萨哈罗夫对当年苏联的批评:“我们的社会必须逐步从非精神性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这种非精神性不仅断绝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可能，也断绝了物质领域进步的可能.”

萨哈罗夫的判断并非全然正确。在精神文明上走入了死胡同的苏联，创造了物质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力量来衡量的。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被视作历史的新动力，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倘若西方的历史动力来源于个人解放后释放出的活力与创造力，苏联则代表集体式的成就。五年计划、集体化、国家工程，个人毫无价值，必须沦为集体目标的牺牲品。它创造了物质上的奇迹，尽管这最终被证明是暂时的，并且伴随有可怕的后遗症。

而一代代中国留学生，曾经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帮助这个新中国发射了火箭，制造了原子弹与氢弹，并被认定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们有多少人对这些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它与这个民族深刻苦难之间的关联，进行萨哈罗夫式的追问……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与能力，变成了哄骗与压迫自己人民的工具。

剑桥杂忆（四）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国内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喜欢叫自己“八零后”。这也是个充满反讽的称谓，他们都竭力表明自己的“个性”，却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装入这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中。

与之前的几代留学生不同，中国不仅不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还要借助中国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期与喧嚣的“中国崛起”重叠。中国与西方正在达成新的权力平衡，不再是一边倒的倾斜。西方的观念、技术、组织不再占据天然的优势，相反地，人们开始认定中国蕴涵着新的成功秘密。留学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来，留学不再是最优秀人才的必然归属，反被视作在国内激烈的竞争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让他们丧失了从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剑桥的中国学生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我目睹了中国学联主席竞选。这是每年剑桥华人社区最重要的政治与公共活动。中国学生是剑桥最大的海外学生群体，算上那些读预科的中学生、来去不定的访问学者，它的数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们数量众多、无处不在，却仍像是剑桥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在剑桥最大学生报纸 Varsity 上，我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我不了解那些数量过分繁多的学生活动，但在演出阿兰•图灵的悲剧一生的戏院里，在书店里，在放映乌克兰大饥荒的小型影院里，我很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同样显著的是，当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时，这里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也没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在街头，我经常看到时髦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穿着那种快掉下来的牛仔裤。他们的脸上早没有匮乏与生涩的痕迹。他们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甚至腰缠万贯。在剑桥、伦敦还有很多英国城市，你都听说过富裕的中国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现金购买公寓、汽车，频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顿吃掉一千镑的火锅。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冲击也早已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淡。他们是看着好莱坞电影、听着 Lady Gaga 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有着新的匮乏痕迹。他们对于全球的消费符号无所不知，对于世界的另一部分却一无所知。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 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即使生

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而中国的崛起则以另一种形态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反而以更迫切的态度，融合到中国的现有秩序中。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也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注入到他们的生活。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商业与消费上的成功，是政治上的停滞与无能，是文化生活中的喧闹与粗鄙。

发生在遥远的剑桥的这场竞选，表现了一切中国内在的困境。化学系这间阶梯教室能容纳五百人，十一月初的这个夜晚济济一堂，一位华裔女警在场外巡视。这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竞选的活动的高潮时刻。

在不同学院的走廊里，市中心草坪边的栏杆上，还有密尔路上的中国超市中，都贴上了竞选海报，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都露着灿烂、自信的笑容。拉票活动以校友、同乡、同系为半径不断外延。新生是主要的争夺对象，他们初来乍到，急需一些指引与帮助，也没有养成嘲讽的态度，很容易被热情的言行打动。临时搭建的竞选班底，在火车站接新生，请可能投票者在中餐厅与不同学院里吃饭，分发来自不同商店的优惠券。一些惊人之举也偶尔出现，候选人会邀请一百位到某学院吃 Formal Hall，这是牛津、剑桥日常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它鼓励不同学科的人自由交流，但在一些夜晚，它被中国学生集体占据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像蝙蝠侠式的长袍，蜂拥而来。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抱怨来到东方的西方列强像是"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如今轮到了我们来做公牛。

在很多方面，这场竞选的确遵循着民主程序。但这民主更像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的一幕，饱含着民主试验中的粗鄙。选举前已传出了"性丑闻"、"贪污案"的消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相互攻击的方式。

这一年共有三位竞选人，其中两位志在必得。而另一位 M 是竞选者中的异类，一个捣乱者。他是物理系的博士候选人，却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内心。他每天穿戴得像是个太空人，浸泡在实验里，和他不欣赏、也不欣赏他的导师一起收集试验数据。他渴望的却是到处流浪，结识陌生姑娘、给他们念海子诗歌的生活。他又没有勇气打破这一切，只能在现实的环境与内在的渴望之间摇摆。他也是我在剑桥最早的朋友之一。当他在两个月前宣布参与竞选时，他成为了中国学生社区中的一个笑话。没人把他的行动当真，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人人都觉得中国学联既太过官僚色彩，也太过庸俗，每一任主席及其班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与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建立密切关系，接待来自中国的政治、商业权贵，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或许用得上的人际网络。剑桥学联主席即使不再如往日那般引人注意，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每年的选举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事件。它甚至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据说它的账目从来混乱不清。

M 的参选给他自己和很多人带来了乐趣。一千多名中国学生使用着共同的邮件组，人人都可能在 Facebook 上相逢、留言，M 则在这个虚拟又真实的世界里，不断攻击学联的制度，指责其他候选者的荒诞，也利用他刚刚赢得的注意力邀请漂亮的女选民喝酒。反正这是一场闹剧，人们乐于看到一个不同的闹场者。没人觉得 M 可能获胜：他既没有任何实际举措，又言辞不谨，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派系网络，这在竞选中至关重要。

当晚的程序是，三位竞选人轮流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投票，统计票数，公布结果。在那间教室里，我感到两种力量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它有着民主的形式，拉票、同台演说、投票、空头许诺、自吹自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如此陈腐的内容。两位主要竞选者的演说内容，围绕着空洞的爱国主义与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展开。他们都提到了二零零八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温家宝总理几个月前在剑桥的演讲，他们声称要成为阻止藏独分子、挡住向温总理掷鞋者的坚强手臂。在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他们的话锋迅速转向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许诺：他们说自己已经与剑桥多少家商户签订了协议，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组织多少次旅行，并成功地把每位的费用又砍下了十三英镑。我像是刚刚读完了《人民日报》，又一头扎入了《精品购物指南》。

大多数人觉得来自清华的候选人 W 会获胜。清华毕业生在剑桥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似乎“又红又专”的清华传统令他们既避免了思想上的分歧，又在实际组织上能力强大。他们也是集体主义的最佳楷模，他们或许每个个体都显得生硬、没有光彩，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这“清华人”则自信与傲慢十足。既然他们的师兄们领导着中国，他们也该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任何组织。他们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有的清华人，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酒肉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碍于情面、或无所谓地为清华候选人投下一票。

但在投票当晚，M 却是全场的核心。他的面色比往日更苍白，尽管在网络世界总是毫不在乎，他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严肃对待。他的短短演说没有任何真正的特殊之处，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只应该是一名稍有想法的大学生的判断。他的演说里没有爱国主义宣言，没有商店的

打折信息，他讲述了自己这个从西安来的青年人最初对剑桥的向往，和到了此地的失望。他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在这座如此浪漫、传奇的大学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探索与碰撞，更缺乏对自身使命的追求。他期望他领导的学联，不再把精力集中于吃喝、游玩，而是放在公共的智力生活上。他让全场屏住了呼吸，接着是狂热的掌声与口号声。

M 最终没有当选，他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原本估计的得票率戏剧性地上升，他也赢得了很多姑娘暂时的好奇心。最终获胜的还是现实的力量，尽管 W 的竞选演说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的项目招标书，精心制作的 PowerPoint 不过是上一届竞选者的翻版，但他最终还是当选了。

没人在乎选举，它带来的喧闹很快被考试的紧张、圣诞节、英国冬日的阴郁所覆盖。也没人指望学联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中国留学生就像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他们充满了集体意识，只有在中国人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安全、放松;他们又是如此的自我，除去私人生活，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忧虑。

倘若这竞选暴露了政治训练的匮乏，那么每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中国社会日渐粗鄙的文化生活的象征。它也是新当选的新一届学联领导班子的主要活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蜿蜒的长队。市中心的一间剧场布满了中国特色，红灯笼、对联、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像是唐人街的翻版。在演出开始前，是组织者们费尽心机、发动庞大网络制作的录像。李宇春、瞿颖、花儿乐队，还有一大批脸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二流、三流娱乐明星，纷纷对着镜头拜年，祝福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我们逃得这样远，却也逃不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包围。这里是剑桥，来到这里的应该是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头脑，他们不仅没准备拥抱新生活，却一心要投入旧怀抱，以赢得平庸与粗俗力量的认可。

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唐人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生活在何处，离中国有多远，时代变得多么不同，教育水准是否改变，他们都像是被施加了咒语，你感到一种东西从未变化，他们总是顽固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唐人街的洗衣工们，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模样，只希望攒下更多钱寄回家乡。而剑桥的青年人成长在即刻通讯的年代，也仍被紧紧包裹进那个中国。

一些时刻，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判断过分苛刻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碰到好几位思想不凡的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清晰和深入的认识，一位比我年轻十岁的历史系硕士，让我叹服不已——他对世界的理解比我更深入和广泛。但他们实在太少了。

我凭什么责怪这么多人呢？他们成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学校中、社会里，都洋溢那股平庸、功利的气氛，他们从未被鼓励参与和了解生活。我们这一代、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一代，才该为此负责。我们更该为中国社会的堕落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437?page=1、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82?page=1）

【返回目录】

【史】

9-6 罗志田：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
——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 10 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 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



胡适在 1927 年曾将其一手推动的“整理国故”诠释为“捉妖”和“打鬼”，其“目的与功用”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以收“化神奇为臭腐”之效。这是许多论及胡适与整理国故关系者颇喜引用的句子。其实，在 1916 年留学美国之时，胡适曾有一首言志的词，自称为“誓诗”，那里面却说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两说截然相反，形象地揭示出胡适一身实兼具新旧中西不同的“两个我”。这是我所见胡适惟一一次这么明晰地表述聚集在他身上带有时空差异的双重认同。一般被视为西化象征的胡适，早年民族主义情绪颇盛，在留学时更一度以复兴古学为己任，这方面的胡适，还需要进一步认识。

我在八年前写《胡适传》时，曾论及少年胡适的民族主义一面，主要依据其早年文字和留学日记，因其日记中断颇多，又经他自己“编辑”，材料不足之处也只能语焉不详。那时耿云志先生已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一大书的实际出版还在拙著之前，然其流通稍广则又在一段时间之后了。胡适留学日记欠缺最多的一段，即 1910—1913 年间。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收有不少这段时间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按梅光迪和胡适是安徽大同乡，1909 年结识于上海，后颇相契，该书所收的梅氏书信不止于 1913 年，写于 1916 年的字数也不少，当

时梅、胡两人为“文学革命”事激烈争论几至决裂，这些信曾为胡适自己在其《逼上梁山》一文中部分摘引，故尚为人知。另据说梅夫人晚年曾辑出《梅光迪先生往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未见，不知是否也有相关内容。对了解两人以及那时的留美学界言，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

今人甚重留学，视之为正途；当年也尽量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梅光迪，却都对留学有相当的保留，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认为“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那篇名文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梅光迪，且该文的写出也受到梅氏的敦促。他们当年有着怎样的思虑？何以会产生“非留学”观念？看看这批书信，也许能获得“了解之同情”，或者还可以进而反思昔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功能与得失。

“五四”学生运动前几年，北大不少趋新师生深感传统的压力（虽然这一压力其实颇具想像意味），却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感受不那么直接，故能激烈反传统；而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校风似相反，或因该校以庚款兴办，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存在太明显，激起师生思想上的反动，直接导致“复旧”的愿望和努力。1916 年就读于清华的闻一多就有意振兴国学，并认为当时新旧两派皆不足恃，只能靠他们这些预备游美的清华学生。

闻氏晚年有句应该却尚未成为“名言”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脱离上下文的这一表述相对中立，其实那时他的态度已逆转，基本赞同新文化运动时北大人的主张，故其“不忘”的结果便是主张继续反传统。但此语体现出的宽阔心胸，或即是“古今中外”色彩明显的清华教育所带给他的。对生于清季的读书人而言，庚款即提示着“国耻”，清华人日日身处其间，民族主义情绪焉能不强。今日有些人侈谈什么“清华学派”，却不及当年清华人耿耿于怀的耻辱感，多少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

（当然，北伐后国民政府接管清华，使该校的隶属关系从外交部转到教育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华师生的心态。据说陈寅恪以新校长罗家伦的姓名为对联，委婉挖苦其“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其实有深意在。假如确有所谓“清华学派”，北伐前以专注于国学的研究院和其后的文史哲各系学风差异甚大，而陈氏固更多代表着旧校风也。）

胡适虽未进清华，然也以此款留学，多少具有相似的感触，而梅光迪更从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说：庚款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故“谓之吾人救国续命之资可矣！以救国续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之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

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梅氏自己在 1911 年初考入清华后，对校园和师资均较满意，但仍不忘此校办学之“款项由奇耻大辱而得”。

胡适初到美国，即与中国同学成立“薪胆会”，其立意多少也针对着上述耻辱，可知那时以“雪耻”为留学目的者尚有人在。梅光迪正从此会看到“复仇雪耻之先声”，他希望胡适等“人人能为勾践，则祖国尚可为”。梅氏本以“与华盛顿相映”的“事功”期之于胡适，对其所学之农科，也从救国方面认识，以为“救国之策，莫先于救贫，尤当从振兴农业入手”，他想知道胡适是否以“东方之托尔斯泰”自命？

但胡适显然不仅有意“立功”，且已有“立言”之意，拟在诗文上下功夫。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盖“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胡适当“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对胡适之所以一再以事功相鼓励，如他后来承认，“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直到他自己在 1911 年秋也赴美留学，得胡适给他一封“约二千言”的长信，才认识到胡适“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不觉对胡适“五体投地”，甚望其“永永为我良友，互相规勉，为他日救国之材。非我二人之幸，实中国之幸也”。梅氏此函差不多也有二千言，从其所论反观，胡适此时已基本不着意于事功方面，而梅光迪也无异议。

这在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转折，即其关怀和努力的方向逐渐从形下之学转向形上之学。此后两人思想观念还有许多变化，这一自定位皆未再转变。后来胡适从农科转到哲学，明确其“有志于立言”的方向，梅光迪极表赞同，认为胡适的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盖其“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

梅氏明言其抱负说：“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稍后在论及学外语时，他表示，正因“我辈志在兼收并蓄”，所学语言门类不可不多，“然德、法文不必求其好，只求能读其高深之书而已足”。这样宏阔的抱负与沉重的责任并存，故梅光迪认



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一世之后，学术大昌，只须人习一学与一外国语足矣”。

从信中这些名副其实的“豪言壮语”看，两人确实都胸怀“大志”。那一代读书人中有此胸怀者尚不少见，大致还继承着传统士人那种“澄清天下”的气概和责任感（不过基本落实在“立言”一面）。但一般在美留学生情形似稍不同，在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而胡适的“狂妄”，却是梅氏“梦梦我思之者也”。两人皆自负不轻，而对侪辈又不甚看得起，正是他们逐渐走向“非留学”的一个伏因。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 10 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 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即使在图书馆中“添一中文部，是犹愈瞽者辨五色、聋者审五音耳。吾恐徒资蠹鱼之腹，不孤负此书乎”。故添设中文藏书，“现在尚非其时”。对胡适提出的练习英语演说，他认为“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乎！”

他因此提出：“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晰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他希望自己三五年后，若“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西学足以取重于彼，又能以西文著书，当要求此邦著名之校添设中文一科，而我辈为其讲师，务使彼人能直接读我之书”。梅光迪后来还真在哈佛大学教了好几年中文，也算是求仁得仁。其实这也是胡适已在思考之事，他在那年 2 月的一篇作业，就是以《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为论题。

可以看出，梅、胡二人当时思想上共鸣处不少，但梅光迪相当遗憾地说，“此事迪若一出诸口，吾国人又当笑为病狂，可叹可叹！然吾与足下自当共勉之以成此志，以为祖国光”。这里说的国人，即指的是留学生。梅氏来美时所携中文书稍多，当地留学生就“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常指其为“书痴、老学究”。据他观察：“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当年留美学生中，教会学校出身者众，这些人不仅不重中文和中国书，根本是中文能力就甚差，有的甚至不会中文，也难怪其以英文往来。问题是这些人英文也未必好，因为他们实不

曾在文字上下功夫：有些人“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梅氏“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另外一些人则因“校中 TextBook 文皆浅，遂以为文不必重”；最等而下之的，是一些学生“以束书不观、略习应酬末务为学。此美国学生大缺点，而吾人摹拟之惟恐不速，真可痛耳”！

在其 1912 年初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更指责当时《留美学生月报》主笔“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当时正值辛亥鼎革，一些留学生认同于清政府乃发自内心，他们当然不会同情“乱党”；同时，若清朝被推翻，许多人的官费即可能出问题，也不排除有些人站在政府一边立论，或者带有些许私心。——（这里的“私心”大约也分两种，一是希望国家不乱，诸事依旧，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受损；二是未必看好民党，担心事情结束后留美监督“秋后算账”，故不敢出声。）

但在梅氏眼中，主要还是因“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他们“多不识汉文，故最恨汉文”。且“近年来此辈之势力大昌，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为事（如欢迎外教，鄙弃国教，亦最可痛心者）。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并且将其文字而亡之，而国亦因之亡矣。故迪对于国学常抱杞忧，深望如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足下其勉之！迪当执鞭以从其后焉。”

这里的思路和表述方式，尤其是“复兴古学”的愿望，都与梅光迪不甚欣赏的清季“言国粹者”非常近似，可见他无意中受其影响不少。——（梅氏曾明确表达了看不起清季提倡国粹者，认为其“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不免“可笑亦可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成功时，梅氏特别感到“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极有价值”，为此次成功奠定了基础。胡适稍后在《非留学篇》中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

崇拜东洋留学生的梅光迪很快“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意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材也，此最可痛哭之事”。他很想和胡适一起去考察美国那种侧重专科的自助式学院，“以便输其学制于祖国”，因

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坚忍耐苦恺切诚挚之人材”，且“尤须深懂祖国文明”，这样的人材“非所望于教会学堂出身、月领六十元官费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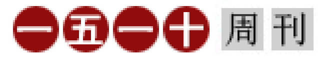
1913 年他到西北大学，发现那里的留学生颇不乏“刻苦自励之士。有不恃他人一文而作工自给者，又自浣衣炊饭，服饰尤朴素。而对于留学界情形，尤与迪同其感愤。江西邹氏之子，家资数百万，近又得官费，而浣衣炊饭自若。迪由是益信停止官费留学之不可缓”。受当地学生影响，梅光迪自己也开始“学浣衣炊饭，非为省钱计，实为练习吾身体、能耐劳苦计”。因为“吾国今日救时之士”，须能“耐劳操作，与至下等人同其甘苦，始可以有为”；故在美国留学，“亦可仿留法俭学会办法”，为其“调查工作之途，以为刻苦有志之士倡”。

反观那些官费生，“月领六十元，衣裳楚楚，饮食丰腴。归国后非洋房不住，非车马不出门；又轻视旧社会中人，以为不屑与伍，而钻营奔走之术乃远胜于旧时科举中人，故此辈官高矣禄厚矣。然试问五十年来，如此辈者，不下千数百人，有几人曾为吾民办一事，稍可称述者乎？”若说讲求学术、“输入西洋文明”，这些人“不但无一本著作，且无一本翻译”。他们回国后，“在中学校，且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莫能予毒”。这样的留学生，“实行不能，著述又不能，要之何用？”

在梅光迪看来，“留学界稍有希望者”，还在于他所看到的私费生中那些“有心人”。他一面主张可在美国尝试勤工俭学，一面强调必须在美国留学界“提倡一种良学风”。同时更当“联合留学界中西学术精通之士，发刊一大杂志（月报，用中文），以饷留学界与国人。庶几留学界学风可改良，国人亦可获益，留学界之名誉亦可恢复”。不然的话，“将来归去，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耳”。

梅氏这次连函详论留美学界的状况，多少受到胡适的推动，当时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的胡适正打算“刊行关于论学论留学界现状之书札”，梅光迪甚愿参与，拟稍改订从前书札，以符合“吾现时思想议论”。至于署名，则以“真姓名亦不妨；吾有言论，吾自敢负责任”。他自认其所论“颇有可采之处，或可置之［《年报》］留学界论学门中”。关于停止官费留学的主张，他更希望胡适“于《年报》中发明其说，以醒吾国人、政府迷信遣派留学之沉梦，则造福于祖国将不浅”。

对其负面为主的观察，梅光迪也承认，他之“痛恶留学界，虽出于实情，亦间由感情用事，有过激失当之处”。主要是他自己英文不够好，而又多带中文书，两者皆为先来的“老学





生"所不欣赏，而梅氏自己却"昂首自豪"甚而"轻视彼辈"，又不善与人应酬，不肯"步老学生后尘，效其风尚"，终至"名誉扫地"；"两年来所受种种之揶揄笑骂，不堪罄述。而吾又不肯变易面目以阿世好。由是一意孤行，由轻视留学生而为痛恶，专从其缺点处观察；虽留学界亦间有美处，然迪以感情用事，不暇计及之"。本来"世间一切事，皆有美恶两方面"，往往是"爱之者只见其?，憎之者只见其恶"，他自己的观察也不免失之于"人情之偏"。

不过，也许担心胡适在正式的议论中低估了留美学界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又提醒胡适："吾之忤俗固然，而留学界之黑暗之罪恶，终不出吾平日所揭破者。足下万不可以吾犹自悔之言，遂将留学界抬高也。吾自忤俗，留学界自黑暗耳。"胡适向来有荀子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果然很快写出了颇具影响的《非留学篇》刊发在《留美学生年报》1914 年第 1 期，其中许多议论明显受梅光迪影响，可见梅氏见解痕迹处甚多（尽管他也缓和了对留学界"黑暗"一面的贬斥）。

如梅光迪以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如希腊、罗马，虽久为瓦烁［砾］，然世界文明史上彼终占一最高位置，为今人所凭吊倾仰。印度虽亡，然印度哲学在今日亦占一重要位置。惟国家无学，事事取法于人，乃最可耻可痛耳（即能效法得当，如彼日人，然究竟在世界文明史上，彼终无光彩）！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试将此与本文开始引用的关于留学是国耻的话比较，其立意甚至表述都非常相似。

再看胡适对留美学界的观察："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关键在于，"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是不能输入文明。这些人连中文都不通，"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即使学问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于祖国之学术文化何所裨益哉！"

二是无自尊心。因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他们回国，自"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



这些观察，与梅光迪之所见所述，何其相似。文中可见梅氏影响或两人“所见略同”者还不少，如当以中文发刊杂志以饷国人等，此处不一一枚举。不过，此时胡适已开始跳出“复兴古学”的思路，将梅氏欲“合中西于一”以开辟祖国学术的愿望表述为“为祖国造新文明”。虽然他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最终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即不再为“弟子国”——的思绪，但“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已经提出，尽管还要过许多年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

胡适承认，中国人眼前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然留学不过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终当“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只有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才能使“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

梅光迪书信中可参考者尚多，容当别论。一般而言，书信、日记、回忆录这类史料可能带有较多个人的“主观性”，我们过去对其使用偏于谨慎。实则如“落花有意”那句老话所云，落花本各有其意，史料不论主观客观，亦皆有其“意”之所在；既知其可能带有“主观”甚或“偏见”，则或尽量去其“主观”、“偏见”而用之，或更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且群体的“人”正由个体的“人”组成，若稍减对规律、结构等面相的关怀，更注重历史的创造者本身，则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一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官方文书多不免说“官话”，刘知几早就说，自从帝王诏敕由臣下拟，便无不“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他名此为“假手”（《史通•载文》），多少类似于古人所谓“代圣贤立言”。杨荫杭视民初军阀混战为“五代”再现，但他发现，若“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年，133 页）。可知档案中不少“官文书”的“虚构”意味甚强，史家有时或不能不从正反两面读之，详另文，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26-2-9.shtml）

【返回目录】

9-7 成凡：百年留学潮里的四个时代精神

“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 56 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 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

在《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后简称《留学潮》）一文中，宋健先生以时间为逻辑，把中国自近代以来 130 多年的留学史分成了十个阶段----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文革以后留学的是第十代。

“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溯觇前八代的经历和贡献，始见第九代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在唏嘘感慨中热望第十代及以后的走向。

而在笔者看来，若以时代精神为整合工具，十个阶段则是可合并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追寻社会理想时代、工业建设时代、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解读留学潮的起落，不能离开对这四个时代精神的基本体认。

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

留美幼童、赴欧的海军留学生和 20 世纪留日等前三波留学浪潮，是归属于“师夷长技以治夷”这个时代无疑。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救民族、救国家”一直是主旋律。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来公开抵制国防、经济近代化的言论日渐式微。

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须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感叹，“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洋务运动是箭在弦上。而在办工厂、兴学堂、建海军的过程中，技术、外语、军事等西学人才短缺的窘境扑面而来。

经 1847 年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872 至 1875 年 120 名 12 至 15 岁幼童分四批赴美，住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后，有人剪掉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这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不顾容闳的反对，二人在 1881 年奏请清廷批准，将全部幼童遣送回国。

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光绪初年（1877 年），清政府又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这批人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77 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 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1877 年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77 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而严复 1879 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 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还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本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

1894--1895 年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东邻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 20 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 5 万人以上。1905 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 960 多位留日学生加盟，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追求社会理想时代

不同于前三波的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留学潮涌，随后的留法勤工俭学和 1920 年代始的留学苏联浪则是有着淡淡的左翼气息并为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所持续支撑。

1915 年，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 年留法）、蔡元培（1907 年留德）、吴稚晖（1901 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 1920 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 1600 人，逐步成全国性潮流。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在 1920 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在此时期赴法学习和工作。

此时的世界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已渐超越主义成为运动，并传播到中国。1919 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

1920 年 5 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

1923 年以后，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的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于 1930 年关闭止，中国留学生总数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 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 310 人。

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

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那就是庚款留美学生。从时代精神上进行划归，因与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第一个时代有明显区别，笔者将其划入第二时代。

1907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 2444 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 0．742 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 1078 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

1911 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 1909--1929 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 967 人；1929--1937 年选送 104 人；1938--1945 年选送 39 人。

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学生。

工业建设时代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与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这次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从 1950 年到 1952 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 年 35 名，1951 年 381 名，1952 年 231 名，1953 年 675 名，1954 年 1518 名，1955 年 2093 名，1956 年 2401 名。1957--1960 年每年四五百人。19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 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 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 9594 人。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 50 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 800 人，共青团中央派出 138 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 7800 人去苏联、

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 609 人，工程技术人员 4876 人，工人 2291 人，其他 44 人。

在 1949--1954 年间，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和抗战胜利后留洋的学生、学者也纷纷回国。不完全资料显示，有 1424 人回到新中国，多数是从美（937 人）、英（193 人）、日（119 人）和法国（85 人）回来的。到 50 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 2500 名。其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回国的。

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和晚清由洋务运动推动的环境有些相像之处，是一种把个体当作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理念推动下的潮涌。只不过，后者的目标是图存而前者是自强。

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

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 年 7 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留学生计划。

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1978 年 12 月，首批 50 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院校。从 1978 年到 1989 年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国的留学生达 9．61 万人。其中公费生近 3 万人。而更多的自费生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求学。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在这一至今跌宕的留学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还原成了大写的人。他们大多无需面对任何组织的眼光，他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甚至可以和不同肤色的恋人享受爱情。如同西方的年轻人成年后会周游列国、体验社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学当成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并在这次体验里重新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把留学看成一个知性上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际地位提高，走出去也不是为了单向度地“拿来”了；中国背景成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时代赋予优势，他们在这种优势里从容交流。

这波留学潮还带来了很多东西，而其中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 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从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从写申请书到邮寄材料，从比较ｏｆｆｅｒ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从预约签证到换外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因为以上这些事超出了父辈的能力。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宋健《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一文，特此感谢。）

（成凡：21 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4-12/30/content_2397504.htm）

【返回目录】

9-8 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



2009 年 6 月 21 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 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 1873 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

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 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 2400 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 1100 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

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 1943 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 1949 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 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1919 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 18 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

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 1944 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

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 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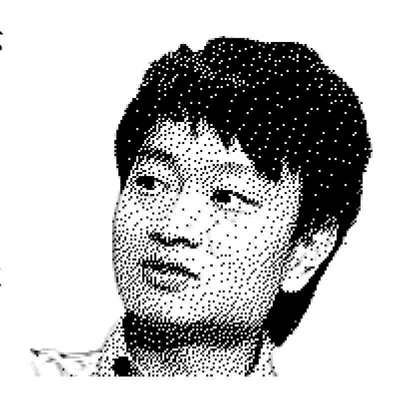
当然 90 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 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 90 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资中筠：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148a630100dogv.html）

【返回目录】

【鉴】

9-9 加藤嘉一：我与中国·从零开始奋斗的八年



“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我亲身经历自己的感触，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点点成果，90%以上都是环境和时代给我的，我的努力，年轻人的努力是正常的事情，你不努力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的环境，包括 21 世纪前十年，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在中国北京，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在中国，每年跟母亲通一次电话回一次家

加藤嘉一：各位晚上好，我是加藤嘉一，今天非常高兴，我说实话非常的惊讶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坐进来和我一起交流，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本人在中国和日本然后还去了中东一趟，我非常重视这次讲座，和期待和各位朋友的交流。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惊喜我的母亲加藤禾子女士，她一块来，作为她的儿子我非常不好意思。刚才是这样子，刚才我从北大那边凤凰会馆过来，我刚才去录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因为窦文涛同志突然跟我说咱们四人行让和母亲一块上来，现在还没有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开始

第一次的四人行，而且有的朋友说她说的比我说的好多了，看来我的饭碗得丢了，母亲讲的非常好。我第一次带母亲到北京，让她了解一下我平时怎么过的，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给母亲讲我在北京干嘛，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天天和我的同学们交流，他们每天在宿舍和父母通电话，汇报一下每天的情况，我有一点不一样，跟母亲差不多一年只通一次电话，然后一年只回家一趟，而且中国是过春节日本是过元旦，所以两者往往产生一种冲突的东西。所以我这八年以来好像是今天的主题是八年的奋斗，我一天都没有休

息，过年都得到电视台做节目等等，所以我非常对不起母亲，她始终没有机会了解儿子在中国干嘛，这次我带她过来应该说也实现了我一点点的心愿。



（加藤嘉一母亲）

但母亲说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到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到了之后她跟我说了，因为她一直在日本通过媒体了解中国，然后她跟我说中国不是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有这么多的朋友吃不了饭吗？机场怎么这么大呢？看得非常的准就是这样子。当然中国这个东方文化重视面子，包括用一些方式来炫耀自己，这个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但

是我认为包括刚刚跟母亲，我们两个人做地铁 10 号线一块过来。她说过马路得卖命，我本来想请她好好吃饭，吃北京烤鸭什么的，让她增加一点体重，但是后来她应该是瘦了两到三公斤，说明她的压力非常大，她说儿子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压力的地方生活非常不容易。这次我非常高兴带母亲过来，也是她第一次到中国的大学，跟大家一块交流，我非常感谢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同学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是代表个人和母亲向大家表示敬意，谢谢。

我为何选择中国留学

我刚刚在路上稍微做了一点功课，虽然字只有我看得懂，我写字不好看，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失控，稍微的做了一下功课。今天的话题是《我与中国从零开始的八年奋斗》。刚才主持人非常夸张的介绍我，我是日本人，84 年出生，当时我来中国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跟现在一样是一个自然人，然后来到这边，北京确实变化很大，当时我看到的情景跟今天母亲看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中国也在变，中国在发展，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打车只有红色的夏利一块二或者是一块六，以及大量推车的，今天可能推车的现象少了很多，所以中国也在发展。很多媒体记者的朋友，可能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来中国，我至少回答过一千多次，现在平时每年大概接受三百次采访，包括电视节目。但我现在还是有必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为什么来中国，可能这个跟各位的选择一样，有主观、客观两种原因这是肯定的毫无怀疑。主观来讲我们日本人在从小的教育体系当中，这是什么？这是网易微博，前一段网易微博不停的要跟我开，但是我没办法我跟新浪签了合同。

我们从小接触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我们在历史课，我们从小不断地接触中国文化，所以明白中国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我是不会选择中国的。有人说我带着这个概念来到中国，没有错，我前几天去了西安，城墙跑了三次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做好运动员的生涯。我来这边肯定是有刚才说的主观因素，还有一点我随着岁数的积累，可能中国在我们日本年轻人当中的地位不断地增加，包括我读高一、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北京申奥成功，包括中日等等的问题，包括大家关心的领土问题凸显出来，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很重要。而且我当年读高二、高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讲过我很想去联合国工作，我从高二开始当翻译，现在母亲在座不好意思说，可能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我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爸爸挑战新

的事业没有那么成功，所以我当初开始送报纸送了六年，到高二的时候我也当了翻译，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跟贸易有关的。然后我当时英文还算是比较好，所以为了在联合国工作，你得学第二国语言。所谓的二外，我觉得选择中文比较好。因为俄语算了、阿拉伯语算了，我刚刚去了中东听不懂，法语对我来说太优雅，跟我不符合，西班牙语太 HIGH，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所以这个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我家庭的经济条件。很多人说你这个人从一个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留学，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对海外留学一般来讲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寻求一种机会，然后学到知识积累了经验之后海归然后创业等等，我当时从日本到中国，当然两国国家的事业不断地缩短。


（学生们在认真听讲座，无一空位）

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当时很想到欧美留学，因为我 15 岁的时候第一次留学，到澳大利亚那算是初中的毕业旅行，然后在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那个时候到那边待了两周，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觉得世界很大，不是日本的习惯，标准和规格，这个世界不仅是平的更是很大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到一个跟日本截然不同的一个大的国家去发展自己，当然最后选择中国某种意

义上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当时我家确实没有太多的钱，弟弟妹妹他们饥饿的情况下，你到欧美留学这是挺不负责任的。所以当时我也认识了北大的领导，这个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的发型不好，我始终对自己的这些都不满意，但这个看情况，有时候到央视，有时候到凤凰卫视，但我从来不花钱，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会降低生活成本。我昨天晚上带母

亲去我住的地方潘家园，一个广西的哥们开面粉的馆，说十块钱，我说十块钱已经很贵了，比北大的那时候贵了一点，我这个人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母亲很担心，我三年没有买过东西了，我对出去唱歌购物没有什么兴趣，我对跑步还是一直要坚持，跑步对我来说是跟呼吸一样重要，跑步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跟母亲一样重要。

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

所以我后来来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当年非常想出国，后来我有幸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本科六年都免费读下来了，应该说中国算是我的恩人吧，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的，我是很幸运的。而且来到北大，北京大学，也是比较好的，我在北大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在北大扩大了很多的人脉，包括 08 年贵国的国家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跟胡主席也交流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开两会嘛，稍微的给个交代，现在开两会嘛。

然后我也陪同我国的一些首相，比如说福田康夫先生到北大演讲，这种机会如果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循规蹈矩的上课肯定是得不到这个机会，我到中国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一切都是没有想到的。大家可以换位思考，我当时不过是 18 岁什么都没有，没有朋友也没有钱，想象力丰富到是现在中国网民的水平都不可能想像到，我现在得到的一切机会都是当时没有想到的。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我亲身经历自己的感触，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环境和时代我认为现在很多包括媒体的朋友，我也知道对我有所关注，但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点点成果，90%以上都是环境和时代给我的，我的努力，年轻人的努力是正常的事情，你不努力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的环境，包括 21 世纪前十年，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在中国北京，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正在跑人生的马拉松比赛

我刚刚跟母亲一块到北大未名湖散散步，我们当然去了我每天跑步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没有做好自己的任务，看来我当时发育的太快，我上小学和初中已经长的太快了，后来各肌肉的结构、关节等等没有发展好，发展跟某过一样很畸形，所以后来退役了，只能转到的别的领域谋生。我每天都会坚持跑步，不管母亲来了没有，跑步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非常重要。

跑步对我来说，首先我正在跑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所以我把这个人生跑下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活法。除此之外跑步对我来说这是很折腾的，因为你当时作为运动员受伤退役，很早 17 岁，后来你接受成为你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运动员的身份这是需要时间的，我当时也比较年轻，至少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接受这个身份。现在跑步对我来说至少有五种意义的，第一保持健康，当然健康很重要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跑步是为健康服务的。第二它是我的爱好，我没有什么爱好的人，女朋友交不到，可怜没有人爱，我母亲为我着急，也很担心我的有关情况，因为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只有跑步所以很多人说你在忙什么？我在忙思考。第三，不可否认我经常要面向公众，包括电视，我现在在日本的青年艺术大学做老师，我在北大也讲课，包括有些电视节目要做，所以作为这么一个人，保持良好的身材是很重要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第四它肯定是给我的写作带来灵感的，因为跑完了步出汗然后洗澡，你的头脑变得更清醒，它给我带来很好的灵感，所以跑步对我来讲很重要，对于我的写作来讲很重要，因为写作是我的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向村上春树学习，这是很重要。第五，我通过跑步来衡量我的状态的，尊重世界这是很不值得推广的一个逻辑和道理，我认为还是状态决定成败，状态对了我认为事情是可以作成的，所以我用跑步来衡量今天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还可以还是非常的差，五种意义跑步对我来说很重要。

为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钱

后来媒体这一块应该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因为媒体呢当然我原来是当运动员，我说实话现在我非常坦白的告诉各位，我 18 岁高中毕业之前没有读过一本书，当然教科书是要看的这是义务，所谓国家制订的义务，当然高中也不是所谓的义务教育的范畴之内，但是被大家认知

为是义务教育，之前我忙得不得了，高中的时候非常忙，一边跑步一边学习，母亲也非常的忙，做饭、持点家务、照顾孩子、照顾弟弟妹妹也非常忙，没有时间看书。我第一次看书是在北大买的五块钱的一本中国跟日本之间关系的书，一年要读三百多本书，因为我没有什么积累，所以我要非常虚心的接受这个事实。我应该好好的看书，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读人，吸收智慧一个读书，一个读人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个要好好做。

媒体这块我没有想到，后来一个契机是我比较努力的学习中文，我为了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钱，没有上新东方，我后来跟他们的人吃饭，他也觉得我的母亲很可爱，像我的姐姐一样。我可以暴露一个小细节，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我真的没钱，没有办法，两天、三天没吃饭到北京站向人家要了几瓶水，当时没有办法到肯德基打工，当时不会中文所以只能弄个薯条什么的，来学学中国的服务，学学中国的社会交往方式，所以我在中国的肯德基打过工，在日本也有。翻译我大概学了三个月之后开始做笔译，过了一年半开始做同声传译，我当时正需要钱，为了谋生，我说过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你谋生过不去还干什么？后来我能够找到同传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要不然过不下去。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学习了中文，主要是靠三种办法没有花一分钟，一个是跟外面卖冰棍的阿姨聊天，她们闲着没有事，这个叫双赢。第二个我买了一台广播，大概是 28 块钱左右插电的，如果是电池的话得经常换，我一直戴耳机放到耳朵上包括睡眠的时候，我彻底拒绝了跟日本人的交往，这也是免费的。日本人懂汉字，看电视是不靠谱的，所以就听广播，看电视你是靠视觉不是靠听觉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三个是跟北大的某个楼的公安干部搞好关系每天拿到他们的《人民日报》每天把他们背下来，我曾经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我相信中国有 13 亿人，但是背过《人民日报》的人应该不多，每天都背。所以我学中文没有花一分钟，这样来过下去，你的生活才会稳定下来。

第一次参与电视媒体对话

05 年我记得很清楚，4 月 8 号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的广场发生了反日的游行，当时我也很荣幸的当北大日本人学会的会长，我跟北京的日本使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互相交换信息。然后强调同学们千万不能去现场，你作为日本人很不安全，因为我当时是有身份的人，会长嘛，虽然我没有什么钱。但是后来我也去了，因为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了解情况的欲望。后来第二天凤凰卫视给我打电话，也是通过一个朋友，凤凰卫视的胡一虎要跟我聊天，

然后我上了胡一虎的节目，胡一虎是我非常好的大哥，我在中国有很多大哥和兄弟，胡一虎让我上节目，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到刚刚带母亲去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后面的凤凰会馆，刚刚我也带母亲去了，十点半直播《全球连线》，胡一虎在三个地方连线，当时我什么也不懂，直播还是录播没有概念，主持人在三国连线，很多问题我也不懂，当时我也只好面对。没有那么紧张，当时胡一虎问我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胡一虎，现在是卢琛和任韧，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们负责的一个全球连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敬请收看。

他们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没去过游行？我说我去了，要是没有去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上。你有没有被发现你是个日本人？我说好像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敏感，他问我说你作为日本人，当时我学中文大概两年不到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觉得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个反对日本的游行，责任到底在日方还是在中方，当时是直播我是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当时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是说不知道是不好的。我大概思考了 0.5 秒左右，然后回答说可能这个回答是比较正确的，我说反日游行这件事情，我们两国人民都看作是一个外交事件，你提及到外交责任也好、原因也好都是来自于双方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因为它叫外交，所以无论如何媒体、民间人士、官方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反思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但是我作为日本人，我国的官方人士言词有伤害中国老百姓，要端正态度、纠正自己的言论，才能恢复双方的关系。我回答了这个问题，胡一虎还比较满意，所以从此以后开始参与媒体活动。

中国是我的恩人，观察中国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后来发展都是很快，05、06 做电视，08 年以后可能我写作更多一点，现在大概可能每年写两百篇文章，我不能更多，好像我特别希望把它减少起来，但没有办法，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太会拒绝，很多长辈们闹我，你这样不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媒体活动直播的增加，我知道这段日子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每天写文章也偶尔上电视发表评论，包括中日关系等等这是相当相当敏感的话题，我曾经也被“喝过茶”，没有“被和谐”过，有关的朋友对我非常有意见，包括最近好像铁道部对我都有什么意见。但是很好我从来都是保持友好关系，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发改委、铁道部什么公安部等等，我始终跟他们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很多人经常为我担心你写了这么多敏感问题，还写了中共的政策，你有没有不安全

的时候？我说没有，我都是非常友好，跟中央和各个部门的官员和领导始终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没有遇到过你不能入镜，被拉走什么的，我非常的安全，很多长辈都关怀我。我刚才说了中国是我的恩人，但同时很多的媒体、文化界、政界非常多的恩人，始终在保护着我，始终在照顾着我，所以我是很放心做好自己，完成我的任务，执行我的任务，这是最重要的。

包括前一段时间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国外相前原诚司先生不得不辞职，这种事情发生我立刻发表自己的言论，从双方的角度，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找到共同合作的欲望从这个角度去发表言论。我不是打广告，这本书《中国，我误解你了》今天《新周刊》我非常信任的张记者，他让封新城先生给我写序，我这里面也说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的让我来说吧，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让我来做吧，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因为中日外交已经不光是中国外交部和外务省来完成的，新的概念，包括民间外交，地方外交现在民间外交有 300 对以上的友好城市，你有这么多好的机制平台怎么不好好利用呢？有这么多的民间人士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做事，包括在中国国内有 25000 以上的日本企业，雇佣者 15000 万中国员工，如果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走，对中国造成的问题是很严重，相对我国经济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当今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每天有一些朋友也比较了解，早上我四点半起床，然后思考、看书、跑步包括讲课、采访电视，50%以上的报纸事情，真的都是很累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次采访都不是很简单的做出来，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因为我不过是一个个人，应该说是一个合法的日本公民，那就是说我是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你也得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好，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说内心话跟各位分享。

虽然我觉得我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始终在怀疑它真的有意义吗？自己付出那么多，让母亲担心得不得了，然后我从来不从有什么回报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像肯尼迪说的年轻人不应该想国家为你做什么，应该是想你为国家做什么，否则这个人的人生是不幸福的。所以我始终不管怎么样，我始终保持一个你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哪怕你吃不了饭，哪怕你简单的过日子，我都会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状态我从小就有，3 岁开始种地，13 岁送报纸，16 岁开始当翻译，到中国到肯德基打工，到翻译工作报名，拿计算机什么有关的文件乱七八糟的翻译，然后一直到媒体写文章做评论，这些过程我认为都是自己点点滴滴的这样做下来。

我认为自己这样的过程，还是相对来说至少能够令人能够接受的，当然这个可能地跟日本的国民性有关，有点自虐，日本人有自虐的心态，好像我国大和民族不太满意，根本不满足现状，所以他们做的是很有效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会把自己的角色做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得到了很多，我不太可能一个一个的说出来，有很多中国的恩人曾经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曾经关怀过我，包括贵国的总书记。

我已经公开的宣布我会把对中国的观察，以及对中国的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我会永远地，至少我活着，当然活着是一个前提，我活着就一定用我的办法去观察思考，表达中国的问题，所以希望这次跟各位朋友好好碰撞思想进行交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谁也离不开谁，是这样一个状态，好像我做得功课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彻底的跑题，这一点我必须得说嗯。

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

我非常信奉的一点是什么呢？可能学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本社会是重视辈分的。我这个人今年 26 岁，我在日本发表什么言论，发表一篇文章都是受到很多的质疑，你这么年轻说什么话？日本在大公司生存你得学会谋生，什么是谋生？在上司和长辈面前装没听到，装不知道，就是装糊涂，否定了不行，否则的话你会被打压的，所以年轻人不可能靠着我自己的名气做节目，到央视发表评论，这个是不可能的。像韩寒出来把一部分的市场掌控起来，然后给社会发表一些公共评论等等，然后通过博客这个载体，在日本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么年轻就发表对长辈的评论，所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谢谢。这种另类就北京而言，不管你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有这么一个状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什么样出身的，甚至是不同种族的，都能表达自己创造市场，这个是有可能的，我只能说有可能。所以我作为八年前谁也认识的人，我也不认识任何人的一个人，在北京这么一个地方，我当然也对现状非常不满意，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做到了什么，至少从零走到一，零加一嘛，我觉得还是跟中国的社会包容性很强，跟它有关，所以我原来在日本得不到的一些感觉，我到中国找到了，这一点非常让我欣慰，所以非常感谢。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年轻人，我评论年轻不太合适，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同岁的就是同龄 80 后，甚至有 90 后，我知道各位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抱怨甚至天天抱怨，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在座的各位今

天中国的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我是 1984 年出生的，已经有一点点头脑会思考的时候，我国经济泡沫崩溃，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祖国正面的新闻，当然这跟政治体制有关，我没有听过好新闻，日本这个好，我国取得了什么成绩，这种我们经常在中国国内听到的话，在日本我们是听不到的，这个决不仅仅是体制的原因，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绝对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形态有关系。

所以我当年的长辈，包括母亲今年 48 岁，母亲她们经历的一些过程，所谓高速增长的那种活力、那种动力，包括当年我们对美国说“不”，后来被中国人拷贝了，我们对美国说不。后来这种动力和活力，我们这一代真的是没有感觉到的，在日本国内，所以年轻人现在有一种萎缩感，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经济不断地萎缩，甚至被萎缩，日本现在的年轻人比各位是迷茫的多，浮躁的多，他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来到中国，我一直认为跟体制有关的问题慢慢来，这个不能着急跟体制有关的问题要慢慢来。不管怎么说，中国今天我所经历的过程，看到的活力，年轻人的向心力，包括在北大早晨五点钟跑步，很多人在朗诵英文课本，这种情景在日本大学绝对看不到，包括你想出国的，在哈佛大学只有日本的一个留学生，中国现在有 50 多位，韩国有 20 多位。日本人包括你去任何地方包括我去中东都不用签证，日本的护照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到阿拉伯都可以接受。我作为日本人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有面子，大家都对我们很好，我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恐怖主义很危险所谓我们进一个楼都要安检，比北京严重很多了。我说我是日本人，他说不用安检的，然后旁边的中国人就骂脏话，就过不去的。我不是骂中国，我们作为日本人是不用安检的，说明日本的形象在外国是相当好的，我们又免签，你还不出去，你有这么好的条件，出国旅游是很好的。相比之下今天中国有这么多人想出国却没有机会和条件，我经常把这个话在日本说，我说你中国年轻人上大学容易吗？我说开玩笑，进北大比进哈佛难多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大家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当然盲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危险。中国人没有盲目的崇洋媚外，我对中国的 IT、创业、科技研发、包括很多人才，美国人做的东西中国人也能做，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自卑，慢慢来，不要盲目的崇洋媚外，我觉得你们奋斗的过程是正确的。

“抗战八年”的一些体会

我给各位说一下，我确实抗战了八年，然后抗战了八年我觉得有三点特别希望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一个人做一件事，环境和时代这个背景很重要，刚才我说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认识这一点。从海外来讲，我这次到欧洲中南亚，中东，大家各位对现状不满，但是从海外来看大家是非常羡慕的，所以你们是幸运的一代，我特别希望各位少抱怨多挑战，所以我希望这是各位最基本的谋生方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个人认为我在中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这也不是说我怎么着，我一直觉得中国包括 80 后、90 后是非常吃亏的。吃亏的原因有两个，我觉得年轻人尤其在一个转型的发展中的社会当中，年轻人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两点没有别的，第一点就是不断地提高自控能力，你能控制什么然后提高这个能力。第二对于你根本不可控的，没有办法自控的事情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从容，至少我是主观认为年轻人在转型社会当中的谋生成长方式只能做这两点。但是我今天不管是在北大，还是我曾经任教的人大附中，还是我到的各种高校，我觉得年轻人很吃亏，一个是大家忽视提高自控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你对于根本不可控的，无法控制的事情，说三到四天天抱怨，所以我觉得很吃亏。真的是状态决定成本，我觉得各位梳理一下，哪些是你可控的，哪些是你不可控的，你弄清楚这两点，然后选择你要做什么，然后不要做什么。

比如说找工作，当然现在我非常的清楚，今天是被就业，前一段两会部长说初步就业率达到 70%、75%，好像没有这么乐观，然后到年底超过 90%，他不可能是少说的，往往是多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现在就业很难，很多人都被就业。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投简历，然后参加什么发表会，然后跟公司的人沟通，希望贵公司能要我。但是这个过程，当然你丰富简历，或者说提高非常实际的能力，当时对我个人来讲，比如说写文章，在主流媒体写文章和发表文章，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可控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最终面试官能否让你过，这个超出了你的范畴，如果当时面试官心情不好怎么办，这个原因不在于你，在于他，你不能因此得出我这个人不好，我没有能力，我这个人不行，今天找工作相当的困难。这种结论法是非常轻率的，现在我看到很多同学，在这么一个你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感到非常自卑，怀疑自己，我认为这种状态是非常遗憾的。

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首先能够认清楚，哪些是可控的，就是自控能够自己控制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不要想，过去就过去了。就像我国的外相前原诚司先生一样，东山再起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卑。而你要认清楚你能够自己控制的地方是哪些领域，你把精力集中、和金钱都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努力，至少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我并不能说我现在很成功，这个跟成功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不从成功的角度考虑自己今天怎么做。《新周刊》的说法非常对，一种毒药叫成功，所以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接下来，可能大家还有疑问，什么是自控能力，什么是不可控的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也是思考了八年，通过我的实践去检验到底什么是真理。包括我本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在人生当中每天都要做的无非就是选择，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你听什么不听什么，你写什么不写什么，人生没有别的，在我看来就是选择的过程，你为选择做什么。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你必须好好从你的角度去理解周围的环境长成什么样子，你今天所处于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对外经贸大学你要谋生必须了解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于的地位是什么，你不好好了解它抱怨是没用的。所以你要做的第一点就是你认真的扎实的去了解，你所面对的环境是长成什么样子。第二个好好分析你是喜欢什么样的人，而不喜欢什么样的人，你是喜欢吃什么，而不喜欢吃什么的人，你是能做什么而不能做的人，这叫自我分析，你了解了自己，接下来就是做选择的高度。我真的非常认为，因为我每天起床半个小时我是什么都不干的，我是在冥想今天想怎么过，我觉得这个时间很重要，24 小时很宝贵，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各位，早上早一点起床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冥想就是想象你今天大概想怎么过，所以这个事情我非常建议各位做一些，这一点非常重要。

给学生上课从来不点名

我此刻想什么我想做什么，不关心的同学可以睡觉，我认为老师没有权利阻止同学睡觉，这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大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大学行政化，这是我刚刚所说的跟体制相关的，因此要慢慢来。第二个我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师生疏远的问题，老师和学生不信任的问题，老师忙你的，学生忙他的，到教室里上网、弄个什么 QQ，还有什么

网络征婚的等等，然后老师都知道的情况下，装没看到，注意学生很麻烦，还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时间、研究、写作、应酬，腐败的时间少了很多，所以尽量不抓学生，我不知道贵校如何。但是老师跟学生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至少在我看来是崩溃的。我认为这个归根结底是跟体制相关，但是我认为它相对而言是一个体制的影响淡薄一点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在日本的一些大学讲课，我的课还是比较受欢迎，我重来不点名从来不布置作业，老师你凭什么布置作业，你点名是因为你没有自信。如果老师很自信，你很喜欢学生，学生喜欢跟你交流，你不点名学生都会来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上课第一步要取消点名，任何问题都有第一步的，中国足球也是一样出发点对了全都对了。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包括中国的相关问题，改革的问题要弄清楚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如果说是体制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不跟体制挂钩的，哪怕一点点能够改变的，让我们好好找到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缝隙在哪里，换句话来讲是突破口在哪里。我刚才说了很多的废话，什么选择、环境改变人，包括年轻人能做的两点事情，从我的经历来看好像是有一点好处的。

从外国的角度去看中国，从中国进入日本

接下来因为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所以我可能得作为一个长子，也要好好地照顾母亲，所以可能我以后回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当然这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在中国待了八年，说实话很累，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了。所以适当的休息休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更多的时间放在别的方面，当然我说过中文写作和表达这是一辈子的事业，我当然都会持续不断地做和关怀。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暂时离开中国，未必是坏事，我说暂时离开当然我会回来的，北大也好包括美丽的经贸大学也好。我很喜欢，我在媒体结识了很多贵校毕业的朋友，包括党政机关都有很多贵校毕业的朋友，我对贵校印象很好。所以我会经常回来的，在中国花的时间可能会相对少一点，也可以从外国的角度去观察中国，这次我去中东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是一个人过去的，当然有关什么国家的部长邀请我我都拒绝了，我去了加沙、以色列、埃及什么，我不怕什么，所以我应该去闯，真的很有收获，中东和中国在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的。比如说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所以我会稍微的控制一点，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对中国，现在很多海外媒体关注有哪些影响，我认为没有影响。当然前提不一样，我是搞国际

政治，所以比较懂这个，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根源，一是宗教、二民族，三资源。中东这个地区这三点全有，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包括利比亚现在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关注，石油资源丰富所以全世界都在瓜分你。中国不一样，民族问题方面汉族是占大多数的，像资源方面中东是石油，中国是稀土，当然稀土问题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的稀土，但是这个跟石油相比还是比不了的。包括宗教问题，中国不信任宗教的。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宗教普及情况，完全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中国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所以中东和中国之间的变革问题，我得出来是一点也没有可比性，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可能会从国外的角度去看中国，我曾经接受过也是支持这本书的封新城总编辑，我接受他的总编访谈录，我认为他给我起的标题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从中国进入日本，日本都是靠着美国的，曾经日本派出大量到美国的留学生，企业也是走出去到美国，以后在中国发展的，在中国做事多年的人，也越来越开始受重视，包括我本人，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政界、经济界还是文化界，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也是比较的悲观主义，我现在也在寻找如何发挥好在中国所积累的经历，包括一些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带到日本回到日本，开发日本的市场，使得日本变得更加健康的社会，这是我要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何从中国进日本，这对日本社会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特别希望我曾经在中国积累的经验在日本有所发挥。最近我在日本的电视上经常做事情，我跟导播和主持人经常做沟通，我特别想跟各位说一句，我最近非常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双方对比，我说一句中国不落后，包括电视制作的过程，当然有一些问题要稍微的回避，电视制作的过程，主持的风格、讨论的深度等，我知道我在中国在凤凰卫视做的经验，完全能够在日本有所发挥。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中国，我也曾经跟日本朋友介绍，所以以后要路过美国，所以我现在始终寻找如何从中国进日本。

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首先给自己解释的问题，向自己回答的问题，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此时此刻我在思考的问题，有三个问题。我在地铁十号线做了功课，第一对我来说中国这个国家，这个载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观察中国你了解中国，你表达中国，甚至有时候把中国的问题，用中文说给中国人，这个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回答。

第二个问题我这八年以来一天不休，奋斗了这么多年，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么八年的时光对于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必须回答。



第三点，你走过了这个时候，这是我从小思考的问题，你这个人是被动生下来的，有父母的关怀我得到了生命，那么这种生命你在享受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也追求一种自己的个人价值，你这个人是一个社会人。就跟一个学者说的一样，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人对社会和自己来说，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刚才提到的都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我从五岁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是解答不了的问题，此刻我得花一个时间和精力进一步的沉淀下来，跟自己对话。看来我得把早晨冥想的时间延长一个小时，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有时候跟自己对话，思考跟活着有关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必要，希望对各位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是一个相对无聊的男人

（互动环节）

现在进入互动环节，我刚刚讲了很多的话，在座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咱们不要那么正式，咱们可以互动聊天谢谢。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还是先从女生开始。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非常高兴你今天能来，前几天我刚好读您的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所以感触特别深，所以欢迎您和您的母亲来到这里。我今天想问您两个问题，读这个书我发现您是一个意志力特别坚强的人，而且善于观察和思考，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缺点呢？

加藤嘉一：缺点太多了。

提问：第二个问题您书里提到精英的定义，你说精英第一个要有潜能，第二个要有公众意识，你说中国的大学生缺少公众意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公众意识，进行自我的提升。

加藤嘉一：非常好的问题，简单明了，我觉得缺点太多了，每个人都有缺点，自我意识很重要，我的缺点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第三个人批评我。我知道一个年轻人谋生要多听取长辈的意见，然后要少听取。这是我很有感触的。缺点很多，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有点死板，灵活性不强，一旦决定要做这个，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要辩证的看，我这个人很死板，比如说昨天晚上半夜一点钟我非得要写一篇文章，这个时候状态是很不好的，很困的，我是很容易困的人，状态不好但是当时要坚决的写下去。这个是不对的，你已经困了，脑

子不工作了写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歇一段时间调整状态再去写，我往往做不到这种灵活太执着和缺点。还有一点我作为男人来讲是相当无聊的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来讲我不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唯一的爱好是跑步，谁愿意跟你？所以我觉得缺点蛮多的。

第二个问题公共意识，当然首先要从老百姓、年轻人和国家政府互相要努力，今天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国家政府为包括在座的朋友们，为年轻人做的事情，领导人也非常的努力去做，这个是我很佩服的。我经常跟日本人说，做中国的领导人是最不容易的，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各位要给中国共产党一点点的时间，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表现一点点的从容。

我觉得第二点，你还要为这个社会，为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国家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你要去做一点什么，我认为你的公共意识开始产生了。剩下我觉得大家不要误会，我举个例子包括这次我母亲来她也跟我反馈了一点，中国人在地铁里在公众场合里面为什么互相的冲突呢？你互让不就得了吗？对，互相让一下，开车也是互相让一下，你最终是从中获利的，我认为礼让不是态度问题，包括日本人和美国人，你说西方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中国宣传民粹主义，但是我觉得你主动了解西方是为了保护你的利益，西方不了解这个原因在哪儿？我的意思是说你为社会付出这种思考不是在牺牲自己，不是你只有付出没有索取，你主动思考能够为社会做什么，你主动去了解对方是一个态度问题，了解对方是一个态度问题，了解自己是一个责任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了解社会是吃亏，不是的，为社会思考为社会贡献是为了自保，不管对方了解不了解你都，你主动了解别人，关心别人，这是为了自保，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谢谢。

跑步跟呼吸、跟母亲一样重要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我也是一个跑步爱好者，我认为您是一个跑步专家了，就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希望您能给我们这种跑步爱好者一些具体的，专业的建议谢谢。

加藤嘉一：我先说个故事，前天晚上我去参加耐克的鞋子赤足体验，因为它也是赞助我嘛，我去参加之前我也跟耐克公司一块推广一个比较好的理念，就是学习和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体育，除了医改还有体改，体改很重要，在中国跑步也好、踢球也好、打球也好，成为专业运动员的人是不能提高文化的，从小在体校里面不去学习，你退休之

后怎么办？搓澡的、卖肉的，你奥运冠军还卖肉？把体育和学习，就是动脑和动脚两个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冠军没有金牌，金牌主义跟 GDP 主义同样很严重要摆脱，这是大家所有人的共识。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认识“文武两道”这个特别好的意见，不要认为你跑步没有时间看书了，不是这样的，跑步不能说是专家，我成为当过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是在体育的家庭出生的，我爸爸从小逼着我和弟弟跑步，大概从五六岁开始，每天跑步，所以我有一个跑步的习惯，我也很幸运在日本有免费的公园和草坪等等，所以我从小跑步。跑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跟母亲一样非常重要，跟呼吸一样，我刚才说了跑步给我带来的五种意义，已经说了，对于我来讲跑步是值得坚持下去的。所以在座的各位不要看北京的污染非常的差说实话北京是很不适合跑步的城市，交通乱、空气脏、道路差，道路太硬，军队要开车，所以硬。所以很不适合，但是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锻炼身体，然后把你的脑子变成一片空白，给你的学习都会带来效力，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跑步，我认为跑步是很重要的。谢谢。

提问：您好加藤嘉一先生，我曾经三次去过日本，大概第一次是十年前，最近两次是前年和去年，我觉得去日本之后给我的感受，尤其是第一次去给的感受其实更多的不是了解日本，是了解自己的国家，是自己国家发展的阶段。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在日本的时候觉得各都很好，包括交通各种情况，觉得日本人对我的态度非常好。回来的时候一进火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回到了中国，因为大家非常的挤，然后可能大家为了争夺座位怎么样的，刚才那位女生提到的公共意识的问题，我特别想问，中国的发展现状是不是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随着物质方面的提升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有提升，这是国家发展的问题，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加藤嘉一：非常好的问题，我曾经问了很多长辈，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东京的地铁道路公共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很多长辈跟我说，跟中国北京差不多少，闯红灯，紧紧，不卫生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八年的时间当中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在地铁里面没有指挥人员，大家都自动排队等等，这认为这是一个发展中一，国民差异也存在，但是这个东方文化是以和为贵，天人和一。但是你刚才提到你到了日本以后，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在这里我说一点，日本社会的发展包括现代化的过程，日本不好的先不提，先说好的一点，它好的一点就是以和为贵，天人和一，如何跟他人友好的发展，它是这么成长的。我们的国策有三个，是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全都是跟以和为贵有关，中国是缺什么就提什么，这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特点。



既然说到这一点，我认为今天日本的中国的朋友们，非常有必要观察日本社会好的因素在哪里，实际上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现在至少在我看来是失去的一塌糊涂，美国的文化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苹果等等，物质文化当然暂时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幸福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人家危害你多少，把你们好的东西夺走了多少。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但是我想说一点在中国中华文化被忽视太多，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到日本以后，能够观察到文化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这不是为祖国打广告，但是我特别希望各位朋友除了美国还有日本，希望大家以后多到日本投资到日本留学，了解日本文化。谢谢。

向日本读者介绍真实的中国

提问：我是学国际关系的，我一直在看你的文章，我知道你的写作对象不只是中国的读者还有日本的读者，比如说你在一些杂志的一系列文章，我一直在看。比如说前几天写对中国民主化的那些问题，我想问一点你想向日本的读者传达一种什么讯息，这是其一。第二你在中国写的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一些中国的问题，你刚才自己也提到，你并不是像一般想像的一样，作为一个外国人介绍本国的东西，而是在介绍你来到这个国家的东西给当地的人，这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

加藤嘉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边听边思考了很多，你刚才提到的这是我在日本的两大专栏，我写的角度和放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想向日本的读者介绍的，当然简单一点来说是比较真实的中国，就是今天在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比如说哎呦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共产主义，政府什么都得管，一点自由都没有，全都是统一的，这个已经跟现实离的太远了。这种东西我拿出我在中国的经历拿出一些故事给别人说，中国价值观也是多元化的，通过自己的经历向日本读者介绍，比较真实相对符合现实的中国，从我的角度这是第一。

第二，我首先说明我最重视的两个专栏，一个是中文网的，一个是看天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天下杂志，我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的，我也希望中南海的朋友都了解，包括前几天的铁道部的朋友也在影响，要影响决策。从我作为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把中国的问题用中文写出来，这是一种乐趣，而且夸张的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把它作为任务来说也是一种快乐。看天下是给年轻人看，给高中生和给中学生看，中间的中年人士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要么影响决策，要么影响年轻人，中间人士是自保，所以影响他们很难，所以我

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稳定，日本人是从中获利的，所以我这么写希望中国的言论变得更加的民主、多元化。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站在我们的角度，中国的开放我们是从中获利的，所以我想促成这么一个点，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爱国主义。

提问：加藤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听您介绍说你现在的一切积累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从政。

加藤嘉一：我刚刚说了吗？

提问：刚才的介绍，我的问题是将来如果你带着民族利益和政治立场，还能保持观点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吗？

加藤嘉一：我觉得能，能。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此刻人类社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所以我觉得我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而且你跟美国打交道跟

中国打交道，我有办法，谢谢。

日本的媒体比任何国家的负面都多

提问：加藤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分享您的宝贵思想。

加藤嘉一：我打断一下，我也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听我的讲座，这是相互的。

提问：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来中国的初衷是什么，您现在从事的事业和工作是您一直以来追求的吗？第二个问题我之前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然后看到当地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访谈节目之类的，大部分就是负面的，在我们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我想之后您如果把事业的重点放到日本的话，能不能对日本国民，从客观的认识中国这一点，能够做出一点贡献吗？

加藤嘉一：第一个问题我好像在我的演讲里面说到了，我觉得来中国的初衷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则，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都是没有想到的，所以初衷我认为并不那么重要，我觉得事情是慢慢会变成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出发点非常重要，但是还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在摸着石头努力的过河，大家不要说我要去美国留学，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情况变得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我们要保持初衷的好处，忽视初衷的坏处。

日本的媒体比的任何国家都是负面新闻，在二战失控的时候，知识分子，媒体没能做什么，没有阻止政府走向失控，我认为日本媒体这么大的负面报道是对战前的反思。

当然什么是客观报道，什么是正确报道，我认为报道是不存在正确的，什么是客观报道，当然你要属实，本着事实关系来写报道，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德，这一点是没有必要多说的。不管是中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都得做到，但是在程度上把握分寸的过程中，如何把它缩小或者是放大，这个是每一个记者、每一个媒体都是不一样，每个媒体都有立场，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的立场具体来说南方报业、新京报、中国时报、环球时报，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环境在多元化，我认为作为民意唯一的客观是什么？是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作为整体的实践走向客观我认为是 OK 的。为此你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至少你懂得一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然后在日本给日本人发表一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我是在做，我能我做到的，我做不到的还要提高我的能力。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我也是学习国际关系的，不过不是北大或者是外经贸，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我想问中国现在的学生，有些人意识比较消沉或者是窝在家里打游戏，或者是比较激进，会发一些反对日本和党的言论，我觉得您看问题比较客观，比如说体制会慢慢来等等。所以您给一点建议，我们怎么能培养积极向上但是并不激进的建议？

加藤嘉一：贵学院我曾经进去过，这个问题当然是你首先要好好努力，让你的现状变得比较令人满意，这样的话你看问题就比较的冷静，看问题比较客观，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不管是从国际政治还是经济，或者科技文化，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提升你的境界，提高你的境界之后我认为你看问题的视角会更加客观冷静。

其他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只能培养自信，我觉得年轻人所追求的三个字，自信、自由、自律，三自经，很重要，年轻人要追求自由，你得自信，但是前提是要自律，你不自律还追求什么自由？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以为释放情绪，宣传反日我牛逼，谁说的？这个人非常自卑，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逻辑，你了解对方，不管对方了不了解国际政治，你看有些报纸经常说西方不了解中国，但是你这个时候可以承认有这么一个视角，这么一个观点这么一个舆论，所以我把他看成一个反精英，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成为精英，不管你的立场是左的右的，是保守的、自由的，你不要从一个乱七八糟的角度去释放情绪，得到一个虚荣心，这样的人非常自卑，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跟八荣八耻一样要注重这个问题。什么是耻什么是荣，不管你的言论对社会有没有影响，你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你把你自己掌握的自信、自

由、自律，然后你少管其他人怎么说你，你去听取他人的意见，你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不要反驳，OK 了，然后你最终综合他人的观点，然后走到你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我觉得你变得更自信、更自律、更自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交给女士，真是令人头疼，那位女士。

提问：加藤先生你好，就是您刚才提到您思考的几个问题，可能是需要一生来思考的问题，您今后会不会写一本书对这些问题来解答，我们想与你分享，如果是你一生想这些问题的话，如果你一直想不出来。因为他们是很复杂。

加藤嘉一：他们指的是谁？

提问：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中国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这八年对您意味着什么，然后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会写，然后我会一直关注。刚才您提到我们要一直多观察去思考，这些都非常的深奥，我们非常欢迎您到二外去。

加藤嘉一：非常感谢，二外坐地铁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我非常感谢下次一定要美丽的二外。

三个问题，我现在我是这样，你提的两个问题是连贯的，我觉得你观察也好，思考也好，当然从我的体验来说观察、思考表达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多观察你多思考，然后有了机会和渠道去表达，变得更自信，你有了渠道，在中国办报纸除了内容渠道更重要。看天下为什么好看？因为他抓住了渠道，在中国不要小看渠道的问题，渠道特别重要。你怎么把握渠道？你是靠美丽、靠帅气、靠魅力、靠关系？真的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渠道很重要，不好意思我说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怎么做才能思考的更好，观察的更好、表达的更好，刚刚提到我的三个问题，也能够更加到位的去解答，我还是那句话我只能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我觉得年轻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跟自己说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成长谋生，我觉得是有三个，我一直跟自己说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势而为。你先得确定方向，方向不要太狭隘，大概你要明白是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的，你要画一下你人生

的比较宽松，整体的一个画，然后你必须得灵活前进，我这个人很死板，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缺点，要灵活前进，但是最终还要顺势而为，顺其自然，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在中国计划真的没用，计划跟不上变化的，有时候努力是没用的，你不要以为我写这么多文章，包括这本书也经过了很多的挫折，写了两年之后才得到出版。但是我给报纸写的文章从来没有被毙掉的，我在中央电视台说话，我知道怎么说，我有渠道，我有办法。所以有的问题不要那么提前的确定，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大家要顺势而为，要确定方向，方向是要确定的，就像一个国家发展，方向必须要确定。贵国已经失去了二十年还不知道你往哪个方向走的国家，因为你不知道你往哪里走。在日本地铁里面全都是安静看书的，脚步声很小，你的脚步声是统一的，你是非常安静的，但是整个老百姓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往哪里走，这是很不幸的。

换句话来说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大方向都可以，有形的无形的，一辈子跑下去，很好的方向，我必须做跟人接触的工作，而不是投资银行面对电脑，这是一个方向，我必须得做促进农村的工作，我必须得做一个长不胖的动动身体的工作，我必须得靠文笔的工作，我必须得靠口才的，像窦文涛先生一样靠口才的，方向太多选择很多，所以我觉得先确定方向，灵活前进，最终还要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做法。最后大家少谈成功，成功真的是一种毒药，你成不成功，至少包括我本人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至少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如果非要用成功两个字，我认为通过好好的落实，包括我刚才说的活法，年轻人谋生的方式，成长的方式，尽量的少走弯路，靠着你的经验、靠着你的智慧、靠着你的外语水平、靠着你的体力、魅力等等，尽量少走弯路已经算是成功了，至少对于我而言，走弯路很重要。上次有一个媒体问我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最想坐牢，经过我的了解我发现坐牢是可以带书的，挺好的，有时候多走弯路是好的，大家不要排除这种选择，这种选择大家不要忽视。不要总是认为主流的价值观，主流的社会是对的，包括在座的这个同学，学国际关系的我们都明白，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词叫多数报正，不是说多数都是正确的，谁说的？我特别希望走在社会边缘，从中抓到本质性的一些活法，我认为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这是个态度问题，我觉得只要你，包括我在活法这一点上，做的相对专业一点，我认为我们的人生也好、生活也好，是比较相对的幸福快乐。当然跟包括我的大哥，白岩松也说了痛并快乐着，他也是我非常重要的支持者，痛并快乐着，这个社会永远是辩证的，谢谢。

主持人：好的，我们的互动环节到此结束了，下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加藤先生的母亲上台。大家掌声欢迎，请工作人员递上签名薄，献上鲜花和礼物。好的，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基本结束了，让我们大家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现在请加藤先生和他的母亲，先退场。

（加藤嘉一：日本作家，曾留学于北京大学。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342891.html）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汪吕杰：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项实证研究

伴随着对新一次移民潮的分析和批评，中国媒体对近年来富豪、精英移民的报道非常火热，但广大的留学生却被忽视，他们或者被认定为富二代和官二代而遭到大肆批评，或者被简单划分为“海待”。但他们真实的态度却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不被国内大众了解。

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道格·康塞尔(Doug Counsell)正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区域选择及其对未来的态度，发表了其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

康塞尔的论文主要根据于 2009 年他对中央兰开夏大学商学院 188 名来自中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主要涵盖三大方面：为什么出国学习？为什么选择英国？中国学生对未来的选择有多大信心？

受访的中国学生表示出国学习的主要原因分别是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更好的语言训练以及体验异国文化。三者比例分别百分之六十七，六十和五十四（问卷为多项选择题）。但也有少数，百分之四的学生表示他们高考失利，被迫出国学习。

至于选择英国，65％的受访者将英国高质量的教育列为选择英国的主要原因。更好的英语环境和较短的学制也被列入考虑因素。此外，4％的学生因为录取的低要求而来到英国。

关于受访者对未来的选择和态度，康塞尔在论文中反复强调了中国学生在调查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因为国内职场竞争压力的加剧，44.5%的受访者对未来并不确定，但中国学生对未来的信心依然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受访者。

因为论文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展现出来，康塞尔的论文风格平实，以数据的总结为主，而没有试图将其结论扩大化。但他的调查却能从实际出发揭示出一些流行结论的根源。

上文所述的两个百分之四，高考失利和录取低要求，被不断夸大，以致这些少数现象被指认为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留学生的主体，导致了国内大众对留学生群体的负面评价。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留学生出国的最主要原因是更好的教育。而教育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存在的，作为广大留学生队伍的普通一员，我对教育方式的客观差别感受很深。而那些因为高考失利而出国的人毕竟是少数，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则是留学生队伍的主体。而且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而只是将海外经历当作求职的筹码之一。

康塞尔同时也指出，留学生在英国同样面临着很大的问题。59％的人有适应当地文化的问题，而 40％的受访者在异乡陷入深深的孤独当中。

康塞尔的调查虽属平淡，但平淡的调查反而更能揭示更多的涵义。面对曾经笼罩在光环下，如今饱受争议的留学生群体，我们更多得在此类平实调查之上，给予客观而又积极的评价。可是现实总是与美好期望背驰，我们都被自己的生活经历裹挟，反而缺乏了对别人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此文的上一个版本自从发表在“政见”网站之后(http://cnpolitics.org/2011/11/chinese-students-abroad/)，引来一些不同意见。总结起来，这些非议主要停留在两个层面，学术层面和日常经验层面。

学术层面的质疑主要就是对此篇论文所用调查方法的怀疑：首先，这些受调查的中国学生是否在说实话；第二，这个调查所选择的中国学生能否代表广大的中国留学生。

在很大程度上，这几个质疑是完全合理的，但这也恰好也是社会科学调查的通病。在对全体留学生进行访问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抽样调查似乎是可行的。但是进行大范围的对身处各个留学国家的各类学生群体的调查则需要一个有浓厚兴趣和强大资源的机构。而这样的机构只可能是中国教育部之类的机构。面对有官方背景的调查，被访问学生是否会如实表达？反倒是康塞尔，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所设计的问卷容易让学生觉得没有压力而说出实话。虽然他只是选择了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商学院学生进行调查，但中央兰开夏大学作为英国的一所中等大学，商学作为目前最受留学生欢迎的专业，这份调查反而能反映很大一部分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将此份调查的结论扩大到其他专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身上存在很大的风险，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份更具体的证据，以及建立在所得证据上的具有一定启发性的结论。在这个层面上，这份调查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关注。

至于日常经验方面的质疑，许多人是根据自己身边那些出国的同学得出与文章完全相反的结论。诸如“身边同学高中后出国大部分是由于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之类的说法也的确被很多人认同，并且引申至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作为“非差成绩留学生”中的一员，我的个人意见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单独个人的认知并不能代表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大部分。我个人不能因为身边的同学大多数毕业于国内顶尖大学而鼓吹留学生中不存在高考失利的情况。其他人也类似得不能将自己的认知推广，甚至以此来批评其他人的看法。在没有获得确实的，具体的证据之前，我们最好只是将个人观点“个人化”。既然现在康塞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对可信的调查结果，即使他获得的结论可能与我们以往的印象冲突，我们不妨听听将之视为一种理性的声音，以供参考。

（本专栏由“政见”http://cnpolitics.org/团队供稿）

【返回目录】

【FMN 新闻专栏】

空气污染

针对北京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有市民申请公开 PM2.5 数据，12 月 2 日**北京市**环保局回绝申请称因 PM2.5 尚未列入国家标准，无法进行评价。同时有消息称京津间将在武清设站点监测 PM2.5 污染物传输情况，但是监测数据是不公布的。

新闻：http://fmn.cc/uZtwVP

http://fmn.cc/sU4002

12 月 4 日 19 时美驻华大使馆测得**北京** PM2.5 瞬时浓度超过空气质量指数(AQI)上限，引爆了民众对于空气污染的讨论，而据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称当天该市空气质量只是“轻度污染”。

新闻：http://fmn.cc/tFq4Po

http://fmn.cc/vigRTr

12 月 6 日中国气象部门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多个地方雾霾笼罩呼吸病患者增多。针对**空气污染**引起的争论，专家钟南山表示 PM2.5 会全方位影响人体健康，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颗粒物上吸附的化学物质。

新闻：http://fmn.cc/vMmiPk

http://fmn.cc/rYRoJk

环保部 12 月 6 日表示民众普遍赞成将 PM2.5 纳入空气质量标准，不过这一标准将在遥远的 2016 年实施。同时有专家指美国大使馆的 PM2.5 数据偏高，因为他们位于繁华、车流量大的区域。

新闻：http://fmn.cc/rAt07u

至于为何**北京**环保局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数据有如此大的差异，一篇学者的分析文章指出，2006 年政府关闭了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监测站，2008 年又将监测站搬到六环以外，不仅蓝天数增加，空气质量报告中的污染浓度也显著下降。

新闻：http://fmn.cc/tP1L9b

西安渣土车

12 月 2 日下午**西安市**一 10 岁女童被拉土车撞倒殒命引发数百名群众聚集，12 月 4 日中午西安一拉土车撞死一中年妇女，群众要求整治拉土车的呼声渐高。

新闻：http://fmn.cc/sdNFdy

http://fmn.cc/vJx2sB

因拉土车引发命案不断，官方要求拉土车禁行整顿 3 天，不过就在整顿第一天，12 月 5 日凌晨西安今年第 51 名市民丧命于拉土车轮之下。**西安**渣土车接连肇事致 51 死，官方通报称“深感有愧”，将大力整顿。

新闻：http://fmn.cc/sOF3MY

http://fmn.cc/saBMTm

人物

12 月 4 日妙觉法师、网友无题和她的妈妈，还有田喜的妈妈一行四人来到草场地 258 号打算探望**艾未未**，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察押到久敬庄关押并做了笔录，不过幸好过程中未收到暴力。

新闻：http://cn.fmnnow.com/?p=1273

方舟子在对李开复的自传打假后，又开始对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履历中的不实之处进行打假，不过报道被各大门户网站删除。而李群则是在**陈光诚**被软禁期间担任临沂市市委书记。

新闻：http://cn.fmnnow.com/?p=1269

FMN

12 月 4 日王雪臻和尚雪山在临沂拉条幅声援**陈光诚**，但却被当地警方带走而不知下落，不过 6 日有消息指尚雪山被治安拘留，却仍没有王雪臻的消息。

新闻：http://cn.fmnnow.com/?p=1300

铁路

自开工之日便受到关注的广深港**高铁** 12 月 1 日上午发生了一起钢筋架垮塌事故，事发在深圳至香港段工地上，并造成了 16 人被埋 2 死 3 重伤的惨剧。而从工地到医院都采取措施严防记者接触伤者。

新闻：http://fmn.cc/t5Z4Y2

7·23 动车事故发生已超过四个月，调查结果仍未公布，而有关动车的两个国家级调查组陷入死结：一是温州动车事故调查迟迟无果；二是动车召回事件的调查悬空。原因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既要平衡各方，又要考虑中国高铁国际形象乃至出口。同样的，此文已在网络上删除，以下是截图。

新闻：http://fmn.cc/stu2aN

安监总局回应备受关注的 7·23 动车事故报告一事称，事故集中调查结束，调查报告正在汇总和整理之中，而“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因此事故调查的进度仍在法规规定的时限之内。”

新闻：http://fmn.cc/sKPN5n

本周其他新闻

安徽、河南两省疑因卫生院重复使用针头导致的众多村民感染丙肝的疫情暴发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官方仍未披露疫情细节。河南永城当地村民指丙肝感染比例惊人，同时村民称治疗费用高希望国家重视。

新闻：http://fmn.cc/vpnxG0

http://fmn.cc/suZZut

牵扯多方利益并引发论战的**中国电信、联通**垄断案，12 月 2 日发改委证实已收到电信、联通的整改方案与中止调查申请，运营商表示将对互联网专线服务进行降价、扩容。对于竞争对手的举动，**广电总局**科技司官员直言不希望发改委中止反垄断调查。

新闻：http://fmn.cc/vd6pNn

http://fmn.cc/u3v2FY

中国近日数十省份秘密开展的**"小司考"**引起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只因参加小司考的一些人员没有法学背景，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在担任着审判员等重要工作，这种不公正的考试存在也被担心影响法官的素质。

新闻：http://fmn.cc/v8UBzN

北京市存在不少的截访的**"黑监狱"**，不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近日首次在公开场合通报了昌平区"黑监狱"事件。该"黑监狱"以帮助维稳为名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并关押、毒打到京上访百姓来获利。

新闻：http://fmn.cc/t31Lot



曾在 2010 年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宜黄**血拆事件的官员官复原职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本周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正式出示有关宜黄强拆官员任命的说明，而二人级别还是正处级。

新闻：http://fmn.cc/w1J0oP

上海一家新加坡工厂因搬迁引发的工人罢工到 12 月 5 日已持续到第六天，抗议的工人堵住工厂的大门使得其他工人无法进出。该工厂搬迁导致部分工人不满上班路途过长、搬迁补偿条件及公司班车安排等配套措施等等，引发了多日的抗议。

新闻：http://fmn.cc/sz8MEu

两部法律的修正草案引起关注，一部是 11 月初就上报全国人大**环保**法草案，其中问责党政官员、环评入法、公众参与等诸多的约束性条款已被删除，被指流于形式。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也存在关键性指标被修改而被指“倒退 20 年”，且标准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度较低，程序不透明。引人担忧。

新闻：http://fmn.cc/rFJx9F

http://fmn.cc/vL3u42

北戴河是中国领导人在夏天集中疗养的地方，而记者调查显示因此衍生出的 100 多家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则常年入不敷出，冬夏两季人流量的反差也带来经营上的困难，每年需要补助数亿元才能维持。随后这篇报道在网络上被删除。

新闻：http://fmn.cc/sjZnPf

新浪因为擅自封锁用户微博被告上法庭，而北京海淀法院判定新浪违约并认为停止服务前需告知用户，这一新闻 12 月 6 日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但是随后这一新闻被删除，我们保留了截图。

新闻：http://fmn.cc/vJZvsL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编辑：黄海 冯自强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